

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

——駁斥右派分子的几个謬論

本社編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年·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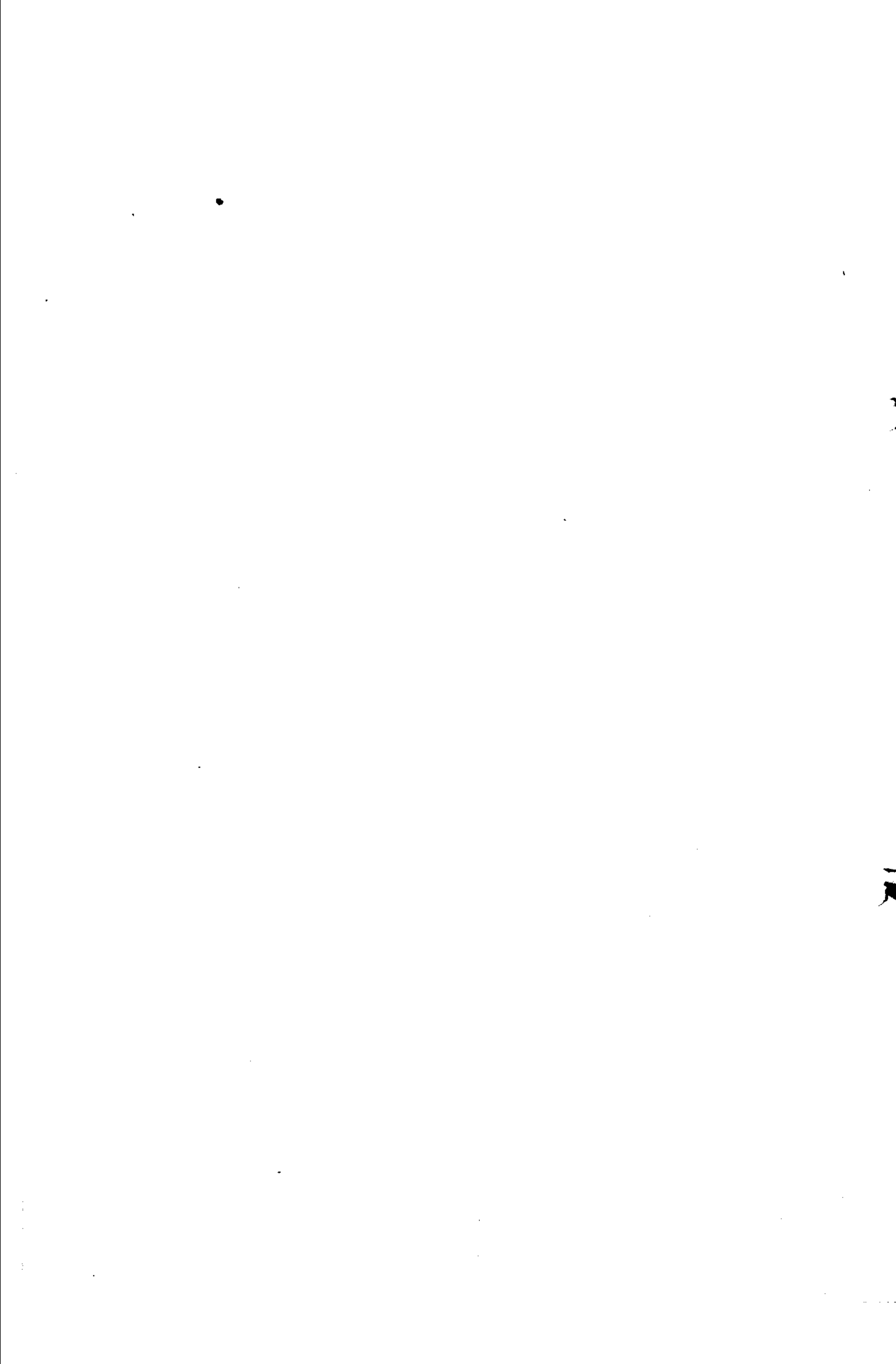
目 次

反右派斗争为什么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

- 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燕 凌 5
- 青年知识分子必须进行思想改造 安子文 16
- 我国大学生为什么必须学习政治理论课 何公颖 26
- 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有正确的
独立思考 “中国青年报”社论 35

党的领导问题是反右派大辩论中的

- 一个中心问题 郑 昌 41
- 论党领导的人民天下 王 力 54
- 共产党能够领导科学、文化和教育工作 安子文 64
- 论社会主义的内行 王 力 71
- 击退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进攻 吴 江 79
- 社会主义制度和等级制度 叶 夔 生 94
- 驳所谓“等级制度” 叶 夔 生 100
- 论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 李哲人 111
- 从右派反苏罪行说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钱俊瑞 127



反右派斗争为什么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燕 凌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社会主义革命时代。

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国家生活着、成长着、学习着、斗争着的青年是幸运的。祖国和人民把艰巨的任务和最大的希望付与这一代青年，这一代青年也在这大变革的时代经受着这个时代特有的锻炼和考验，要把自己塑造成社会主义的新人。

目前全国范围内的反右派斗争正在扩展和深入，这正是青年们进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极为有利和千载难逢的时机。是不是积极参加这次斗争，在这次斗争中表现如何，也正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分野。

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

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上半年，在我国出现了一次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在一个六亿人口的国家里，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很快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党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都是多么正确多么英明。正象不久以前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的一位代表说的，新的经济制度象是应用“无痛分娩法”诞生的，大革命而一点也没有发生大

混乱；不但人民生活沒有发生大的动荡，而且在受灾的艰难的条件下工农业生产仍然平稳上升。党充分地运用了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经过和平的道路直接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成功地领导了一次不流血的大革命，而且是从根本上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制度的大革命。毫无疑问，这是我們全国人民的大幸福。可是，正因为革命的性質是和平转变的，所以，革命任务虽然根本上变了，革命队伍却沒有根本上改組。很长一个时期，人們說到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的时候，指的是民主革命呢，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呢？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并不十分明确。只贊成民主主义革命而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仍然貌合神离地留在革命队伍内部。多次群众运动，基本上划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同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民族资产阶级之間的界限，却沒有比較明白地划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間、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的界限。经过1955—1956年的群众运动，经济制度（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完成了（也还没有全部完成——大多数公私合营企业还没有变成国营企业，一部分半社会主义性質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没有变成社会主义性質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可是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却远远地落后了。这新的经济基础和旧的上层建筑之間存在着对抗性的矛盾；为新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新的上层建筑同旧的上层建筑之間，也存在着对抗性的矛盾。这矛盾是客观的存在，是誰也掩飾不了的。遇到一定的时机，它必然要爆发出来。在今年5、6月間党开始整风的时候，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乘机向工人阶级、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想要推翻共产党的領

导,把我們的国家扭上資本主义的道路,他們好騎在劳动人民头上,“自由自在”地作威作福。在这情况下,工人階級就不得不展开反击。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是社会发展的規律决定了的。我們当前的任务,就是力求使我們主观的努力符合客观的規律,把这场斗争进行下去,繼續展开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场斗争中,把資產階級右派集团的脊骨打断,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孤立起来,使他們在一般情况下再也不能兴风作浪,使資產階級思想再也不能泛濫成灾。不如此,就談不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就談不到社会主义建設的順利进行,也就談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这场斗争进行得好,就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在我国出現一个生动活潑的政治局面——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暢;这样,就利于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使社会主义建設不断胜利,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巩固。

有人認為:“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因之对这次反右派斗争沒有足够的重視。这是不对的。資本主义之皮,目前也并不是已經完全不存了。即使到了确实皮已不存的时候,資本主义之毛散发的臭气也还是会害人的。更何况,資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同它的基础的关系,也不簡單是毛与皮的关系。資本主义經濟基础死去了,上层建筑阴魂不散,它总是想要借尸还魂,使僵尸复活的。

有人認為:“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因之对这次反右派斗争沒有足够的重視。这也是不对的。要知道,資本主义思想在人們思想中还是根深蒂固的。毛主席說过,对資本主义傾向稍微放松,它就会泛濫。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尙未深入进行的情况下，秀才同政客勾結起来，并不是不能造反的。造反即使不成，对人民也会造成損失。

無論从哪方面來說，都必須把反右派斗争——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的偉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社会主义力量同资本主义力量 不共戴天的斗争

政治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指民主党派的社会
主义改造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成員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純
洁和团結。我国的民主党派，多数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
它們的党名大都有“民主”兩字；它們的成員一般都来自資产
階級和小資产階級上层，或者是这些階級和阶层的知識分子
(至于其中一个党在党名上挂着“农工”兩字，那正是章伯鈞設
下的騙局和阴謀，是他早就居心同共产党“爭天下”；其实，这
个党的黨員既无工也无农)。这些人的政治面貌当然并不都
是一个样子。應該承認，其中很多人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了
民主革命，是对人民有功劳的；其中一些人經過革命的鍛煉和
共产党的教育，已經轉變了階級立場，真心地拥护社会主义革
命了。另外有一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就不是真心参加革命
的，他們另有个人的政治野心。另外还有一些人，本来是反动
的統治集团中的人物，有的在人民革命胜利之前不久，才投到
人民方面，有的是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才加入民主党派。后
面这几种人，在全国解放后这些年里，有一些人的思想或多或
少有所转变；有些人却坚持着反动立場，頑固不化。在革命性
質和平转变以后，这些人物都表示“拥护社会主义”，通过走社
会主义道路的宪法的时候，他們都举了手。有的是真心，有的

是假意。在他們的假意還沒有暴露的時候，一般地說，真假還是難以分辨的。可是正象紙包不住火一樣，假意很難永遠遮掩真心。在共產黨好心好意地對他們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希望以後，就有一些狂妄的家伙以為這是共產黨軟弱可欺，積極活動要脫離共產黨的領導，要站在資本主義的立場同社會主義唱對台戲。他們不擇手段地追求組織的“大發展”，甚至專門搜羅對黨不滿的分子、犯過錯誤的人，以至判過刑、受過管制的反革命分子。他們的“最低綱領”是與共產黨“平分秋色”，“最高綱領”則是“取而代之”。不久以前，他們把“大放大鳴”和幫助共產黨整風看成了實現他們的資本主義好夢的機會，就利用他們在一些民主黨派和國家機關中的領導地位，採取合法、半合法和不合法的種種手段，到處“放火”，到處煽動。在6月6日前後，他們被自己放的火燒昏了自己的頭腦，儼然以為共產黨“大勢已去”，只待他們出來“收拾殘局”了。時代給了他們多大的諷刺！僅僅兩天之後，工人階級為了保衛社會主義，對他們展開了反擊，他們就發現了自己處在一種多麼可恥而又可笑的位置。可是，經過這次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大暴露，也使我们更加明確地認識到了：必須把政治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決不可草率從事，半途而廢。許多右派分子都是民主黨派的中央負責人，他們的陰謀活動是利用民主黨派的組織進行的。個別黨派（如民主同盟和農工民主黨）和它們的某些地方組織，一度成為右派分子反社會主義的工具。人民不能不要求各民主黨派，經過反右派鬥爭，對整個組織進行改造，徹底改變它們的政治面貌。在一些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中，甚至共產黨內和共青團內，也有一些政治面貌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完全相同的人，人民也不能容許他

們繼續玷污革命隊伍，從內部奪取社會主義的堡壘，要徹底地揭發他們，改造他們；堅決地同他們進行鬥爭，把其中頑固不化的死硬派分子作為政治垃圾清除出去。

社會主義思想同資本主義思想針鋒相對的決戰

思想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一方面是指要在絕大多數人的思想上解決究竟要不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以及同這個問題有關的一些重大問題；另一方面是指純潔社會主義的思想工作隊伍和加強社會主義的思想戰綫，對知識分子進行社會主義的思想改造。非社會主義的思想，在人們的頭腦中是會長期存在的，社會意識落後於社會存在，本是常有的事。到將來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以後，非社會主義思想也還會殘存很久。因此，社會主義的思想教育工作，是要好幾代都要繼續進行的工作。在這一次反右派鬥爭中，思想戰綫上的鬥爭採取了全民性的大辯論的形式。這次大辯論，已經解決了或者正在解決着這樣一些重大問題：過去這幾年和目前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工作做得對不對（成績是主要的，還是缺點是主要的；為什麼某些人要故意抹煞成績、誇大缺點）？是不是應該走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好，還是資本主義好；為什麼某些人口頭上“擁護”社會主義，却在實質上反對社會主義）？要不要共產黨領導（不要共產黨領導要誰領導；為什麼某些人口頭上“擁護”共產黨領導卻又說共產黨不能領導這個、不能領導那個，或者怪共產黨管的太多了）？要不要無產階級專政（反對“黨天下”和要求“輪流執政”的實質是什麼；肅反究竟做得好不好）？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什麼是社會主義民主，什麼是資產階級民主；什麼是真民主，什麼是假民主）？要

不要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怎样对待外国经验？什么是教条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辩论，是社会主义思想同资本主义思想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决斗。在共产党员整风中，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也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几种表现形式）也已经进行了批判，今后也还要继续不断地批判；同时，对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另几种表现形式）的比較集中的批判也已经开始。这方面的思想斗争，也是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很重要的部分。

說反右派斗争是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說要改变人們头脑中的某些錯誤的反动的想法（虽然这是一定要做的事），同时要改組思想工作战线和改造思想工作者本身。我国有相当多的知識分子，脑子里浸透了资本主义的毒液，一直做着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的幻夢。表面上看，他們也在随着时代前进，可是，他們是躺着不动被革命的列車拖到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旧的思想原封不动或者动的很少。离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越近，他們越觉得看不惯、不舒服，总想叫时代的車輪向后轉。其中一部分人混进了社会主义思想工作者的队伍，在社会主义的思想陣地上筑上了资本主义的思想堡壘，或者篡夺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工作的堡壘，从里面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革命者和建設者放出了冷枪。有一个时期，文汇报、光明日报、时事手冊、文艺报、新观察等报刊就被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篡夺或部分地篡夺了，发表了許多不利于人民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煽动性或誣蔑性的报道，中国青年报在这方面也犯了一些錯誤。文艺界、教育界、科学界都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活动。人民不能再容許这些人再来毒化人民的

思想，不能容許这些人再把青年和学生引上荒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对这些思想战线上的右派分子，必須彻底地揭发，坚决地斗争。经过这场斗争，使从旧社会过来的絕大部分知识分子摆脱右派分子的迷惑、影响和捉弄，改造成为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同时，要培养大批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青年成为出色的理论家、科学家、工程师、教育家、文学家、艺术家、編輯、記者等等，大大加强社会主义的思想战线，根本改变思想战线的面貌。

不要忘記匈牙利十月事件的血的教訓

我們一定要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打个大胜仗。这一仗打不胜，经济战线上已有的胜利就不能保持和发展，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也就没有什么希望可言。讓我們的战斗意志象走上革命战争的战场的时候一样昂揚起来吧！要知道，这场战争沒有真正动刀动枪，只不过因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还没有把刀枪弄到手。誰能說，章伯鈞在八年以前要搞軍事斗争、要有他們“自己的总司令”的“雄图”在近几年已經自动放棄了！誰能說，这一次“大放大鳴”当中高喊要“杀共产党人”和想要“机关枪調轉枪口”的那些人，在真有那样的机会的时候还会“只是喊叫喊叫”？以为只要把生产关系改变了就可以不再注意阶级斗争了的同志，还是再讀一讀“共产党宣言”里面的这几句話吧：“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中最下层的阶级，它若不把压在它头上而由組成正式社会的那些阶层所構成的全部上层建筑物抛出九霄云外，便不能伸腰，便不能抬头。”这里說的是“全部上层建筑物”啊！如果只是完成了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經

济基础,而不彻底地进行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摧毁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究竟会落个什么样的结果?这已经有个活生生的实例了,就是匈牙利去年十月发生的事情。匈牙利早已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变成了社会主义企业,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实现了相当大一部分。可是去年十月以前,在政治上,肃反一直没有很好地进行,党内又被资产阶级代理人纳吉等人侵入;在思想上,对旧知识分子没有很好地改造,许多重要的思想斗争工具(包括报刊、电台和学校讲台等)掌握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当时,党的领导又有严重的缺点,这缺点被政治上思想上的敌人利用,就发生了去年十月的事件。这是血的教训!全世界工人阶级都不能忘记它!

战斗决不止于这一回合

我国资产阶级右派对共产党的领导不服气,对社会主义革命不顺气,他们倒是看准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不巩固的,就下定决心要同工人阶级较量一番。一个回合,他们就吃了当头一棒,退下去了。服气了没有?有的服了,有的仍然没有;有的嘴里服了心里仍然不服。顺气了没有?更没有。还需要多给他们吃些“顺气丸”才行——要继续同他们讲道理,尽最大努力使他们把思想弄通,真正抛开资产阶级的立场,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认识真理,认清大势,气自然就顺了。有少数死硬派,硬是不肯吃药,那只好让他们把气憋在肚子里,以至带到坟墓里。只要他们不进行破坏活动,不触犯社会主义的刑律,他们是有这样做的“自由”的。不过,对我们来说,却也并不就此停止战斗。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说我们“气量小,爱斗争”吧,我们必须下决心同他们进行长期的斗争。

長期，有多長？難說。只要世界上還存有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國際上以至國內的階級鬥爭總是要繼續進行的。不能設想，他們已經不會再有興風作浪的機會。一有機會，悶在肚子裏的氣還是會“放”出來的，至於會刮成幾級風，那要看各方面的條件如何了。我們的防風工作做得好，它的风力就可能小。還不能忘記這樣一條真理：社會意識是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反映。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物質基礎現在還是很薄弱的。在我們建立起來現代化的工業基礎和現代化的農業基礎，需要多久時間呢？就目前的情況看，大約還需要再有兩個到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整個過渡時期，也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至少，在這期間，階級鬥爭的火焰是不會熄滅的。——不是我們不想使它熄滅，而是資產階級不肯使它熄滅。

青年們要在鬥爭中把自己鍛煉成 社會主義的新人

為了各個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為了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然後準備逐步地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工人階級必須有自己的強大的知識分子隊伍。青年是這個隊伍的重要的組成部分。青年時期是有最大的“可塑性”的時期，青年可能接受工人階級的領導，把自己塑造成工人階級的忠誠戰士，也可能接受資產階級的影響，把自己塑造成資產階級的“英雄人物”。每個青年都應該爭取把自己塑造成為社會主義的新人——既有社會鬥爭知識又有生產鬥爭知識，既愛學習又愛勞動，既懂得民主又懂得集中，既有創造性又有紀律性，既活潑又堅強，對社會主義事業和人民民主制度無限忠誠，排除了各種各樣的資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雜質，脫

离了一切低级趣味。这样的新人，要在革命斗争的风暴中成长起来，而不能在温室里培养出来。在历次革命斗争、群众运动中，已经出现了不少这样的新人；在目前和今后的斗争中，必然会出现更多这样的新人。在目前的斗争中，每个青年都正在过社会主义的关，决不是如某些人说的“已经过了五关，何须再谈改造”。青年的出身和经历各不相同，过去所作的主观努力各不相同，在这次斗争中的表现也就各不相同。有许多人在平时注意了对自己的社会主义教育和集体主义锻炼，这一次在大风浪中就站稳了立场，成为社会主义的“青年近卫军”。事实也证明了：只要稍一放松对自己的社会主义教育，稍一放纵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等资本主义思想，都有可能堕入资产阶级右派的圈套，甚至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想要游离在斗争以外，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想要躲开斗争的风暴而祈求健康的成长，更是不可能的。

反右派斗争就是这样的革命，它有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胜负，也就有关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它有关我们这一代与后代的祸福，也有关每一个青年的前途。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也有伟大的国际意义。青年朋友们，勇敢地坚决地投入这次革命斗争吧！不要犹豫观望，不要草率收兵。让我们在大革命中经受大考验和大锻炼，让我们在这伟大的变革的时代茁壮地成长起来！

（原载1957年8月9日“中国青年报”）

青年知識分子必須進行思想改造

安子文

在这次反对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大多数青年知識分子的表現是好的，他們拥护党的領導，贊成社会主义制度。在党的领导下，許多青年知識分子都能够坚决地反击右派分子，捍卫党和社会主义。但是，也应该看到，有少数青年知識分子在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是担任了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鋒的角色的，他們四处縱火，八面搦风，把一些大專学校以及一部分机关、团体，搞得烏烟瘴气，天昏地暗。他們虽然象西游記上所写的观音禪院里的那群惡和尚一样，为了劫取唐僧的宝贝——袈裟，不惜放火烧掉寺院，结果是惹火烧身，烧死了他們自己。但是，那种黑烟漫漫、紅焰騰騰的不平常景象，却在一定的時間內，迷惑了相当多的一部分青年知識分子。他們或同情右派、发生共鳴，或犹豫观望、动搖躊躇，以至对大是大非失掉了政治嗅觉，对大善大惡缺乏識別能力。有的迷失方向，有的誤入歧途。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除了少数敌对的右派分子是别有用心，企图搞垮党和社会主义以外；对于絕大多数青年知識分子來說，关键問題在于他們沒有进行彻底的思想改造，因而他們就沒有坚定的工人階級立場，沒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这里，我想就青年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談几点意見。

一 青年知識分子要不要改造

青年知識分子要不要改造呢？回答是：青年知識分子同其它的知識分子一樣，必須加以改造。我國的青年知識分子絕大部分是出身于剝削階級家庭的，並且曾經受過一些資產階級的教育。因此，他們都程度不同地受了資產階級思想的影响，沾染了一些旧的习气。“出污泥而不染”的情况是沒有的。縱然有少数人出身于非剝削階級家庭，但是他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在现实社会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間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誰战胜誰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長的时间才能解决，資產階級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識分子的影响还会長期存在。目前，資產階級思想还在頑强的与工人階級思想爭奪陣地。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劳动者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識分子，也是容易受到資產階級思想影响的。列宁在1905年曾經引用了考茨基的話来批判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与无产階級在經濟上是沒有什麼对抗的。但它的生活狀況和劳动条件却是非无产階級的，因此在心理方面和思想方面也就有相当的对抗。”（列宁：“进一步，退兩步”，見“列宁文选”兩卷集第一卷，第466頁）这种对于知識分子的分析，是針對俄国的旧知識分子說的。目前我国知識分子的生活狀況和劳动条件与当时俄国旧知識分子的情况是不同的，但是，这种对知識分子思想狀況的描述，对于我国的青年知識分子，也是有现实意义的。另外，青年知識分子还有一个突出的缺点，就是缺乏政治經驗和階級斗争知識，他們往往容易为資產階級的奇談怪論所迷惑，被伪装分子的甜言蜜語所欺騙。所有这些，都說明了为什么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特別要选定青年知識分子做为他們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的对象，为什么右派分子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找到了活动市场的原因。从以上各种情况可以看出来，青年知识分子的改造是十分必要的。

有人说：“我们这些青年知识分子都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天然就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不需要什么改造了。”应该说，青年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新中国培养的。但是，除了党团组织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以外，还要通过旧知识分子培养他们，而许多旧知识分子并没有经过彻底的改造，他们还有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和观点，这样，青年知识分子就不可避免的要受他们的影响。有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甚至是由一些有严重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或者是右派分子一手培养起来的，如右派骨干分子王造时“培养”的马明敏，反共老手聶仲元“教育”的耿秀田都是明显的例子。即便是由共产党培养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也还是要随着社会的改造，不断地改造自己，否则，也会被资产阶级思想所腐蚀，甚至可能掉出时代的列车，变成工人阶级的垃圾。因此，青年知识分子要进行改造是不容置疑的。

也有人說：“解放八年来，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不需要再继续改造了。”事实是否是这样呢？这次反右派斗争证明了青年知识分子不是改造得很够了，而是改造得很不够。我們說：改造是没有止境的，世界上并没有已经彻底改造了的“圣人”。一个人必须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资产阶级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你留一分，它就可能长一寸，你不改造它，它就要“改造”你。事实证明，那些认为不需要继续改造自己的人，往往还是最需要改造的。

二 改造什么

青年知識分子改造什么呢？主要地是改造思想。就是要把資產階級思想改造成为工人階級思想。什么是工人階級思想呢？工人階級思想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而資產階級思想就是自私自利，唯利是图。

我們知道，知識分子本身并不能单独構成一个独立的階級。在階級社会里，他們虽然拥有一定的專業知識，但是并不直接掌握生产資料。他們只能依附一定的階級，并且直接間接地为这个階級服务。旧社会的知識分子的毛，是附在五張皮上面的，这五張皮就是：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資本主义所有制，还有民族資本主义所有制，小生产所有制。过去的知識分子，他們吃的是私有制的飯，是直接間接为私有制服务的。

在新社会里，剝削階級已經基本上消灭了。旧社会的五張皮已經不存在了，我們已經挖了它們的根子。現在我国社会的基本力量是工人和农民，他們占人民的絕大多数。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知識分子同資產階級結合，为資產階級服务的社会基础已經不存在。現在知識分子是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工人階級身上。是誰給他們飯吃呢？是創造物質財富的工人和农民。既然这样，知識分子就只有全心全意为工农服务才有出路，才能發揮自己的作用。为此，知識分子就必須不断地改造自己——被自私自利的資產階級思想，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人階級思想。

个人主义、絕对平均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等等，都是資產階級思想的具体表現。这些錯誤思想的根

源都是自私自利。青年知識分子必須防止与克服这些錯誤思想，才能树立工人階級思想。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暴露出在青年知識分子中普遍地存在着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不良傾向。因此，有必要着重談談这两个問題。

个人主义是剝削階級社会的产物。个人主义者奉行的信条是：“人不为己，天誅地灭”，“人是自私自利的动物”，“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个人主义者在考虑問題和解决問題的时候，常常把个人的利益置于人民群众的利益之上。由于知識分子沒有直接与大生产相联系，因而就缺乏集体观念。在他們看来，个人的知識和能力是决定性的东西；个人的利益就是一切。这样，就使知識分子具有个人主义的劣根性，个人主义的毒菌从而也就最容易在他們身上繁殖。知識分子的名位思想和风头主义的孽根是很难鏟除的，为了个人利益，他們往往強調要发展个性。右派分子正是利用了他們的这一弱点，向他們放出了“个性解放”的糖衣炮彈，企图以此来破坏我們集体的社会生活的准则，妄想从根本上来肯定資产階級个人主义在我們社会中的合理性。我們說，馬克思主义是主張发展个性的，并且只有在消灭了階級和剝削的社会中，个性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发展。但是，个性的发展必須以集体的利益为前提，离开了集体利益的“个性”是落后的，反动的，我們絕不能允許損害集体利益的个性“解放”。从这次反右派斗争中也可以看出来，有許多青年知識分子正是由于个人主义得不到滿足而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滿的，有的人甚至从严重的个人主义走上反动的道路。右派骨干分子林希翎的墮落，值得每一个青年知識分子警惕。

自由主义是欧美新兴資本主义制度上升时期的产物，它

在經濟上主張自由競爭，它是為資產階級剝削勞動者服務的。自由主義在政治上的要求，就是要使資產階級專政的制度永世長存。在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中，許多右派分子打着“爭民主、爭自由”的褪了色的旗幟，蒙蔽了許多青年知識分子。這說明青年知識分子對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紀律的關係，還有着極其錯誤的認識。

民主和自由，都有階級性，普天之下，民主和自由只有具體的，絕沒有抽象的。民主和自由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它們是和一定社會制度或者階級密切聯系着的。我們要的是社會主義的最大多數人的民主和自由，不要資產階級的少數人的、虛假的、殘缺不全的民主；也不要資產階級少數人的、貪婪的、剝削和壓迫別人的自由。我們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就是說，這種制度是既有高度的集中，又有廣泛的民主；既有必須遵守的紀律，又有最大限度的自由。集中和民主，紀律和自由，結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我們的目標，是要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但是，知識分子是不大習慣集中和紀律的，他們認為這些會束縛他們的“個性”，因而往往片面地要求民主和自由。這就給右派分子以可乘之機。右派分子提出的“民主”，是少數反動派的民主，他們提出的“自由”，是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自由。假如他們的陰謀得逞，我們就將失掉絕大多數人的民主，就將喪失革命、建設以至生存的自由。右派分子的徹底破產，教育了大家，大家應該切記不要上右派分子“假民主、假自由”的當。

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的根本問題，在於轉變立場，也就是要把屁股從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椅子上，轉到工人階級

的椅子上去。階級立場是政治思想的基础。有了工人階級的立場，才能有工人階級的思想。但是，立場這個問題，許多青年知識分子還是沒有完全解決的。在這次反右派鬥爭中，所以有許多青年知識分子犯了錯誤，摔了跤子，就是由於他們沒有堅定的工人階級立場。沒有正確的立場，自然就不可能正確地辨別是非，識別方向。例如“草木篇”十分明顯的是一棵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但是，有些青年知識分子卻把它當成“鮮花”，並且十分“欣賞”，認為它是“贊揚了知識分子清高孤傲的性格，歌頌了青年男女堅貞不渝的愛情”。這是為什麼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沒有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階級分析的方法加以鑒別，沒有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去看問題。因此，一個青年知識分子如果真正要樹立工人階級思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必須首先具有工人階級立場。只有這樣，才能辨明大是大非，才能够與各種非工人階級思想進行鬥爭。

三 如何改造

青年知識分子的改造通常是經過兩條道路：一條是經過社會生活的觀察和實踐；一條是經過一般的理論學習。這兩個方面是互相聯系的，一個人的思想轉變常常都受這兩方面的影響。但是，對於青年知識分子來說，最重要的是參加實際鬥爭鍛煉，與工农結合，到群眾中去，經常接受黨的基層組織的領導和群眾的監督。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的重要區別之一是在於他們同工农的關係如何。只有在思想認識方面，在實踐方面懂得依靠工农，全心全意為工农服務的，才是真正的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青年知識分子在未經改造以前，最大的缺點是：認為自己“有知識，有能力”，眼

睛向上，看不起工农。他們把工农看成是群氓，是“零”，認為这个虛数，只有加上知識分子这个“1”，才能变成实数，才能起作用。而事实究竟怎么样呢？恰恰相反，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实是比較地最沒有知識和能力的。他們沒有生产斗争的知識，甚至連五谷都分不清楚；他們也不具备階級斗争的知識，甚至不知道依靠什么社会力量进行革命和建設。我們說，智慧是从群众那里来的，世界上决定問題的，是劳动人民。沒有經過改造的知識分子，既然他們仅仅具有脫离了实际的“知識”和脫离了群众的“能力”，那么，他們就必然象离开了大地母亲的安泰一样，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将一事无成。青年知識分子只有与工农結合，向工农学习，为工农服务，才能發揮自己的作用。为了能够与工农結合，青年知識分子必須去接近、了解和熟悉工农，与工农交朋友，在思想感情上与工农打成一片。但是，有許多青年知識分子却与工农格格不入，他們不喜欢工农的感情，不爱他們的姿态。这些人的立足点还在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那里，他們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王国。这样，他們与工农結合的問題就无法解决。要解决与工农結合的問題，青年知識分子就要下决心到群众中去，就要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練。但是，無論時間怎么長，青年知識分子却必須彻底地解决這個問題。青年知識分子要使自己为工农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沒有这个变化，沒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

也有些青年知識分子不愿接受党的領導和群众的監督，他們喜欢自由散漫，往往強調个人志趣，而不愿服从集体的意志和紀律。列宁在“进一步，退兩步”一書中，曾經引用考茨基

的話來說明這個問題：“‘知識分子却完全不是如此。他并不是以这样或那样运用实力来进行斗争，而是利用論据来进行斗争的。他所用的武器就是他个人的知識，他个人的能力，他个人的信念。他只有凭靠自己个人的品質，才可获得相当的意义。因此，在他看来，表現本人个性的完全自由乃是順利工作的首要条件。他作为某个正体底附屬部分的資格服从这个正体是很勉强的，是迫于必要而不是出于本人意愿来服从的。他認為紀律只有群众才需要去遵守，而上等人物則是不必遵守紀律的。至于他自己，那他当然是把自己列入上等人物的……’”（見“列寧文选”兩卷集第一卷，第467頁）。

我們的看法是：党的領導，是青年知識分子走上正确道路的決定關鍵，群众的監督是青年知識分子胜利前进的必要保證。因此，青年知識分子必須接受党的領導和群众監督，必須服从集体的意志和遵守紀律。否則，他們就会迷失方向，喪失革命意志，甚至墮入資產階級的泥坑。有的青年知識分子不但不服从党的領導和接受群众的監督，反而把自己置于党和人民群眾之上，說什麼：“知識分子只能治人，不能治于人”。这显然是剝削階級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荒謬言論的翻版。有这种思想的人，把創造历史的人民群眾看成阿斗，而却把知識分子美化成“圣人”。他們蔑視党的領導和人民群眾監督的結果，必然要走上反党、反人民的道路。許多青年知識分子之墮落为右派分子，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嗎！

青年知識分子为了改造思想，轉變立場，真正成为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还必須認真地学习馬克思列寧主义。我們知道，馬克思列寧主义是工人階級思想的科学表現，是一种最正确的，最革命的政治观点，是我們一切思想、工作的指針。不

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能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沒有灵魂。青年知識分子只有認真地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点,才能有崇高的理想和奋斗的目标,才能有前进的动力;也才能在階級斗争的风浪中,站稳立場,明辨是非。有的人說:“我們要先專后紅”,这样提出問題是十分錯誤的。右派分子也正是企图利用这个口号,使青年知識分子失掉正确的政治方向。“專”和“紅”的关系是政治和业务的关系,“專”是必要的,但是“專”是离不开“紅”的,离开“紅”的“專”,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是毫无用处的。青年知識分子只有既專(有一定的專業知識)又紅(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貢獻出自己的力量,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这里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青年知識分子在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时候,必須联系思想,联系实际,要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矢”,射自己思想行动的“的”,进行思想改造。只有这样,才能把書本上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实际行动中的馬克思列宁主义。

目前的反右派斗争,对于每一个青年知識分子來說,都是一次重大而实际的政治考驗。每个青年知識分子都應該投身于这场火热的階級斗争中,把自己鍛煉一番。要通过反右派斗争和全民性的大辯論,提高自己,使自己成为真正的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时期,組成一支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队伍,对国家和人民來說是十分必要的。这个新部队,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經過改造、站稳工人階級立場的一切知識分子。青年知識分子要做一个真正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要与工人、农民一道,共同推动历史前进,就必須在党的領導和群众的監督下,学习,再学习;改造,再改造。

(原載“中国青年”1957年17期)

我国大学生为什么必須学习政治理論課

何公穎

資产階級右派从我国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发动了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的猖狂进攻。我国的教育制度，特别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也是他們进攻的重要方面之一。在有右派分子猖狂活动的某些大学学校里，“取消（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論課程”成为他們进攻的具体行动口号之一。由于右派分子在这里也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运用了同样的“斗争策略”——惡毒地利用了我們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曾經在一个短时期內模糊了部分青年同学的視綫，使他們未能及时看出这个口号的反动实質。

右派分子在“取消政治課”这个問題上，玩弄的一套詭計就是：以攻击“教条主义”作为幌子，一笔抹杀几年来大学政治課教学的成績，把过去的政治課教学工作說成漆黑一团，企图使人們对这門課程的講授和学习失掉信心。他們說“过去的政治課都是‘教条主义’，学了比不学还坏”。并且，为了达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不惜大量歪曲和捏造事实，把我国某些培养馬克思主义理論教学人員的大学咒罵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教条主义的大蜂窩”。事情果真是这样嗎？

首先，讓我們把今天大学生的政治思想面貌和解放初期的大学生作一个簡單比較吧。解放初期的大学生，由于長期受国民党反动統治的影响，除了少数先进分子以外，多数人还

缺乏坚定而明确的民主革命立场，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划不清界限。这就是说，许多人还分不清敌我，分不清民主革命的是非。针对这种情况，党和人民政府举办了許多新型的革命大学，同时，在各个大、专学校中广泛开展了政治思想教育，其中也包括例如“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初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接着，又以分清敌我为主要内容，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我国大学生又进一步受到了教育。后来在这样一系列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基础上，正式设置了系统讲授马列主义的政治理论课程。从此，大学生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就比较为正规，也比较为系统了。今天我国大学生的思想面貌和解放初期比较起来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不仅已经明白了民主革命的是非，而且就多数人来说“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毛泽东）七年来，我国多数大学生从对民主革命采取怀疑、观望甚至敌视的态度，走向“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啊！引起这个变化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能说七年来的政治理论教育不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吗？能够说过去的一切政治理论教育毫无成绩，都是“漆黑一团”吗？

其次，谈谈关于所谓政治课的内容全是“教条主义”的问题。也还是让我们看看事实吧。远的不说，目前大学里几门政治课的基本内容，无非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对这些基本原理的讲授有无缺点是另一回事，这里的问题是：能否把讲述这些基本原理本身叫做“教条主义”。右派分子正是这样看待问

題的。有的右派分子說：學生學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以後，無非僅僅懂得一些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的道理，這就是“教條主義”。我們說，僅僅懂得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的道理當然是不夠的，但是從一個受資產階級世界觀影響的青年知識分子走到懂得和承認這個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應該說是一個巨大的進步。難道“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這個原理是“教條”，懂得這個原理就叫“教條主義”嗎？是的，右派分子所說的“教條主義”，正是指這些在我們看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否則，怎麼能說明政治課的內容全是“教條主義”呢？從這裡，我們可以又一次受到教育：立場不同，對同一事物會得出根本相反的結論。在我們看來，目前政治課的基本內容是馬克思主義，在右派分子的字典里卻叫做“教條主義”。奧妙原來就在這裡。

但是右派分子絕不只是攻擊“教條主義”而已，他們的目的是在攻擊“教條主義”的幌子下，企圖販賣資產階級的貨色。他們一方面叫囂着要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課退出學校；另一方面卻對過去那一套以資產階級思想為內容的課程大肆吹噓，說什麼資產階級的社會學、資產階級的法學、資產階級的教育學，是“幾十年研究的成果”，是必須繼承的“文化遺產”等等。原來他們是要“取而代之”！

右派分子的這種陰謀，本來也沒有什麼奇怪。在階級社會里，說“學校可以脫離生活，可以脫離政治，這是撒謊騙人”（列寧）。因為不論是什麼學校，包括高等學校在內，不是本着這種政治原則為着這個階級培養服務人材，就是本着那種政治原則為着那個階級培養服務人材，“脫離政治”或“超政治”，事實上是沒有的。有人說，在有些資本主義的國家里並沒有

什么政治課，这种說法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也是无知。資產階級專政的国家，为了資產階級的利益，教育在实际上是“資產階級各种原則的注入”（馬克思）。資產階級的統治者和教育家喜欢說他們的學校可以不問政治而为整个社会服务，其实，“提出这个原理的資產階級自己就把資產階級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一位”（列宁）。請看，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不正是这样“教导”我們嗎？

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認為在階級社会里，教育从屬於政治，是階級斗争的武器和工具，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就有各种各样的教育。如果說資產階級專政国家里的教育，实际上是“資產階級各种原則的注入”，那末，在无产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的国家里，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應該是“尽量广泛尽量深刻地把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灌輸到工人階級、农民和知識分子的腦筋中去”（加里宁）。因此，在我們看来，我国大学里設置馬克思主义政治理論課程，这是一項不可动搖的、帶有根本性的措施，这是由我們国家的性質——无产階級领导的人民民主專政所决定的。

我国正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时期，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已經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階級斗争并未結束。“无产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争，无产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态方面的階級斗争，还是長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之間誰胜誰負的問題还没有真正解决。”（毛泽东）在这种形势下面，要求大学里取消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論課，这就是要求无产階級放棄思想陣

地而讓資產階級取得思想陣地，這就是要求放棄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來改造世界，而企圖用資產階級的世界觀來改造世界。整風運動以來，有些大學里的右派分子與社會上的右派分子相呼應，甚至扮演了“前哨戰”的“先鋒”角色，對共產黨的領導、對社會主義展開了猖狂進攻，恰恰證明了這一點。在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面前，我們相當一部分大學生在一個短時期內產生了思想混亂，他們當中有些人曾經一度被政治野心家章伯鈞、羅隆基等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所蒙蔽和利用，曾經把浸透了資產階級毒素的林希翎的“演講”誤認為是“香花”。這種情況說明了什麼呢？這不正是說明我們許多同學分清敵我、明辨是非的能力還不强，社會主義的覺悟還不高嗎？這不正是說明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思想占領陣地，必然就會有資產階級思想占領陣地，作為一個大學生，一個知識分子，如果“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於沒有靈魂”（毛澤東）嗎？

我國是一個文化落后的大國，受着高等教育的大學生是我國的寶貴財富。國家和人民殷切地希望大學生們能成為有益于人民的人，“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在我們所處的這樣一個社會大變動的時期里，要做一個真正具有社會主義覺悟的勞動者，就必須學會善于分清敵我、鑒別是非，以便在政治思想鬥爭的風浪中站穩社會主義的立場。大學生由於他們的出身、地位和年齡的關係，由於他們是社會主義下一代的接班人、未來的國家幹部和人民的先生，這個問題就更加重要。目前我國大學生，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出身于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的家庭。這是中國的社會歷史條件所決定的，這並沒有什麼可以責難的。但應當

看到，由于家庭出身的影響，他們就比較不容易接受无产階級世界觀、站穩无产階級的立場。何況，大学生一般都是讀过十几年書的青年人，就是說，不論其家庭成分如何，他們自己总是直接脫离劳动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的，他們的思想感情容易和劳动人民有距离，沾染一种讀書人的“优越感”，即是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旧思想。大学生的年龄又正是处在一种世界觀和人生觀形成的时期，不是接受这样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就是接受那样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所有这些，都說明大学生需要进行思想改造，需要学习馬克思主义。

同时，我国大学生出学校以后就要成为我国各种社会主义建設崗位的干部，其中許多人还將在我們的党和国家机关中，在各种經濟、文化事业組織中担負一定的領導职务，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骨干。既然是国家的干部，建設的骨干，就势必要在不同程度，不同範圍內参加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我們国家的指导思想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制定我国各項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我們正确去执行政策的行动指南也仍然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要在我們这样的国家里，作一个忠实于人民、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好干部，如果对馬克思主义毫无所知，是不可能正确貫徹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的。就拿“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政策來說吧，毛主席說：“百花齐放、百家爭鳴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沒有階級性的，无产階級可以利用它們，資产階級也可以利用它們，其他的人們也可以利用它們。”我們要正确的利用它們，就要有无产階級的、馬克思主义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毛主席又說：“所謂香花和毒草，各个階級、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想法。那末，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們今

天辨別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毛主席提出了六条标准，但真正学会运用这六条标准，仍然需要有馬克思主义作思想武器。正确理解和执行“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政策是这样，正确理解和执行党和国家的其他一切政策也是这样。

还有，我国大学生是具有較高文化水平的知識分子，而知識分子是教育人民的人，是人民的老师。这里所說的“老师”，当然不仅包括学校里的教师和一般教育工作者，还包括其他的知識分子通过他們的文化技术、精神面貌和言語行动对人民群众的广泛影响。由于我国是一个文化技术落后的国家，知識分子在社会上的这种作用就更加重大。要教育人民，就发生了如何教育的問題。是用資产階級的世界觀和資产階級思想去教育人民呢，还是用工人階級的世界觀和社会主义思想去教育人民？我們不能指望一个充滿資产階級思想影响的人，一个不懂得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能够有成效地用工人階級的世界觀和社会主义思想去教育人民、影响人民。同时，我們还應該看到，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正在日益提高，在一些重大的是非問題上，他們的鉴别力已經超过了我們某些“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的知識分子。在这次反击右派的猖狂进攻中，全国各地工人、农民表现了严正的立場，他們十分尖銳地揭露了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并且坚决的起来維護社会主义利益。劳动人民的这种表现，和我們某些知識分子在这场斗争中的言行比較起来，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么？就在这件事情上，我們也可以看出：“教育者必須受教育”。一方面知識分子要同工农結合，必須在劳动人民面前“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另一方面，知識分子要作社会主义觉悟日益增長的人民的老师，自己就必須大大提高社会主

义覺悟，必須更加努力学好馬克思列宁主义，否則，是不会受到人民欢迎的。

最后，我們还應該看到，有些資产階級右派分子伪装成拥护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面孔，說什么“馬克思主义是要的，可是，在我們国家里，从生活中、工作中无处不可以学到它，为什么一定要在大学里專門開設政治課呢？”这是一种阴谋，必須揭穿。

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則之一是理論和实践的統一，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十分重視直接参加革命实践对于領会、掌握和发展革命理論的重大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說，在生活中、在各项革命工作中去学习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馬克思主义者所一再強調的。事实上，我們許多同志也就是在經常的时事政策学习中，各项工作經驗的总结中学到了許多馬克思主义的道理。可是，馬克思主义者在強調从实践中学习革命理論的同时，絲毫也沒有忽視系統学习和鑽研革命理論的重要性。这是因为馬克思主义是一門科学，既然它是一門科学，就需要系統学习和鑽研才能很好掌握它。早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一八七五年），馬克思主义創始人之一的恩格斯，就曾經这样劝告过当时德国的工人运动領袖們，要他們系統地鑽研馬克思主义。他說：“自从社会主义成为科学以来，它就要求人們去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說，要求人們去研究它。”我們并不否認，过去政治理論教育在教材和方法上，有脫离实际的缺点，在个别学校、个别課程的講授中还是比较严重的。我們应当总结經驗，加以改进。可是，我們的立場和出发点与右派分子是截然不同的，我們是为了如何把馬克思主义的政治課教得更好，使大家受到更多更好的馬克思主义教育，而右派分子

則是企圖根本取消政治課，根本削弱和反對進行馬克思主義教育。為了使今后的政治理論課教學搞得更好，我們必須首先與右派分子的思想劃清界限，肯定政治理論課絕對必要，肯定過去的成績，然後才有可能採取種種措施克服缺點，提高教學質量。

問題已經清楚了。大學能不能“取消政治課”呢？不能取消，相反，應該大大提高和加強。這就是我們的回答。

（原載“學習”1957年14期）

要有正确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才有正确的独立思考

从刘宾雁到林希翎，右派分子們一个个都打起了“独立思考”的旗号，对共产党大肆攻击。他們叫囂說：共产党把青年教育坏了——它不喜欢青年們“独立思考”，把青年教育成了“唯唯諾諾”、不动腦筋的人。

果真共产党不叫青年思考嗎？当然不是。党和毛主席一再教导青年“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要“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还力图把事情說成这样：好象只有毛主席或党中央少数几个負責同志是在动腦筋、出主意，其余的人都是“思想僵化”了的“保守主义者”，这些“保守主义者”自己既不动腦筋，也害怕敢动腦筋、敢提問題的青年。但是，难道說，只是党中央少数同志筹划一切，沒有全党各級組織和广大干部的主动性，沒有他們去充分动员广大群众創造精神，沒有他們对錯綜复杂的各种事物的分析思考，就可以取得举世公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了嗎？任何一个稍稍明白事理的人都不会相信这种謊話：党中央英明的政策方針，竟是依靠一些“沒有头腦”的人来实现的。我們的人民和青年有沒有成为象右派分子所誣蔑的那樣“唯唯諾諾”、“沒有头腦”的人呢？我們只要举出各种积极分子大会、先进生产者大会所反映的无数生动的事实，就可以証明我們今天的时代，是人民的創造力空前旺盛的时代。沒

有这样富有智慧和創造力的人民，我們的国家也就不可能获得今天的如此巨大的成就。

可見，右派分子的叫囂純粹是誣蔑，他們原來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独立思考”的美丽外衣下，他們提倡怀疑一切，否定一切，从而想把我們引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为了揭穿他們的这一阴谋，我們有必要分辨清楚：我們提倡什么样的独立思考，他們提倡什么样的独立思考，怎样才能有正确的独立思考？

首先，我們認為要有正确的立場，才有正确的独立思考。右派分子叫囂說：“有了立場就沒有独立思考”。这里，右派分子在标榜絕对的“独立”和“自由”，絕对“公正”的客观主义立場。其实，他們的立場是最鮮明不过的。在本报三版的前几期的“討論会”中，已經有不少同志用事实揭穿了，右派分子的“独立思考”，只是在漂亮的口号下搬运資产階級的、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理論殘渣。事情很清楚：在現在的階級社会里，不站在无产階級立場上思考，就必然站在資产階級立場或者地主階級立場上思考。右派分子为什么这样忌諱階級立場的分析呢？就是因为，階級立場的分析会象照妖鏡一样，給人們照出他們的資产階級的原形。我們无产階級却不怕公开声明自己的立場，因为我們的利益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站在无产階級立場上的独立思考，首先就是善于識別公开的和隱蔽的階級敌人，在階級斗争中明确而坚定地分清敌我。毛主席說过：“对于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这嗅一嗅，也就是政治警惕性。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一書中也說过：“我們要有清

醒的頭腦，善于來分別考察各個事實。黨的組織和名實相符的黨內領袖底作用，也就在於要使本階級一切有思考力的代表，在長期的、艱苦的，各種各樣的、多方面的工作中，培養出必要的知識、必要的經驗、必要的（除了知識與經驗之外）政治警覺性，以便敏捷而正確地來解決各種複雜的政治問題。”在這次右派進攻和反右派鬥爭的大風浪中，也可以從對右派進攻有沒有政治警惕性的問題上，來考驗一個青年有沒有真正正確的獨立思考的能力。事實證明，許多被右派分子攻擊為“唯唯諾諾”的青年，在這場鬥爭中，敏捷地、正確地判別了政治方向。他們在右派猖狂進攻的時候，不僅沒有隨聲附和，相反地，他們挺身而出保衛黨和社會主義，他們是真正的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勇士。也有一些青年，由於平時不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認識，忽視思想改造，頭腦里有許多資產階級的思想感情，一到大風浪里，就模糊了階級界限，政治警惕性毫無，喪失了立場，作了右派的應聲蟲。這是我們應當引以為戒的。

正確的立場是和正確的观点、正確的思想方法聯繫在一起的。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無產階級科學的宇宙觀和思維方法。我們思考和認識問題是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思想的。右派分子又攻擊說：“馬克思主義給思想加上了框框，妨礙了獨立思考。”真是這樣嗎？我們都知道，馬克思主義是指導工人階級進行革命鬥爭的理論武器，它的目的就在於解決工人革命鬥爭中的實際問題，它本身已經向人們提出獨立思考的要求。如果馬克思主義妨礙獨立思考，列寧又怎麼能夠以馬克思主義指導俄國革命，不僅取得了革命勝利，同時還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呢？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在中國革命的一系列的根本問題上，規定了適合於中國國情

的路綫方針。難道不也正是獨立思考的典范嗎？右派分子所以不顧歷史、不顧事實地攻擊馬克思主義，也就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能幫助大家明辨是非，在階級鬥爭中識別敵我，在爭論中識別香花、毒草。

也有的右派分子叫囂說，別人說過的話，就不要去重復，已經確定的原則也都要重新估價。這也是惡意的挑撥和煽動。我們說，我們的目的是為了掌握真理，而不是為了標新立異。既然有已被無數事實證明了的真理，我們就應該服從這個真理。地球是圓的，硬要說成是方的，當然是愚蠢的。而且在政治上不實事求是，堅持標新立異來反對黨和社會主義，也就是右派分子反人民立場明顯的暴露而已。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的根本特點。我們的獨立思考是凭借於實事求是的調查研究和科學的分析的，是親身參加革命實踐，以實踐為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毛主席說過：“不凭主觀想象，不凭一時的情緒，不凭死的書本，而凭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這種實事求是，認真追求真理的態度，資產階級是做不到的。資產階級由於剝削階級的階級利益的限制，不能不百般歪曲事實、掩蓋真理。我們把所有右派分子的言論拿來看，就不難發現他們的欺騙、誇張、造謠和誣蔑。但是有些青年却認真相信了他們，這除了反映立場模糊之外，也反映了我們自己還有很多虛夸和不老實的地方。這次反右派的鬥爭，在思想方法上，對我們也是一次很好的鍛煉。

立場、觀點、方法既然不同，對許多問題的解釋就不同。右派分子有意識地用“獨立思考”來動搖青年對黨的信任，企圖摧毀共產黨員的黨性、共青團員和革命干部的紀律性。他

們把服从領導、服从紀律等都說成了要不得的“盲目服从”，而加以反对。而且，右派分子站在資產階級个人主义的立場上，当然也不能理解：我們的服从党、服从領導、服从紀律是完全自覺的。共产党之所以能有任何其他政党所不可能具有的鉄的紀律，正是因为它的成員有高度的自覺，他們深知他們執行的政策方針，他們所捍衛的全党的統一，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他們既把人民的利益看作自己的最高利益，就能够坚决地服从于統一的紀律，同时在工作中發揮高度的創造精神。而且共产党的鉄的紀律，是和高度的民主精神相結合的。正是党，吸取了全階級的智慧，集中了全階級的思考，制訂出党的科学的革命的方針、政策、決定。正因为如此，它就有权利要求全党一致的服从，这是建筑在高度的革命自覺性的基礎上的，而不是右派分子所誣蔑的所謂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唯唯諾諾”。

我們也反对盲目服从。但是我們不是否定服从，而是反对盲目性。譬如，有些同志对党的方針政策不求深入的理解，对实际情况不加系統的調查，这样，在認識問題、执行任务中就不免有簡單化的、主观主义的毛病，甚至把好事办成坏事，这也就是盲目性。我們反对盲目性，目的在加强对党的政策和实际情况的研究，以求更好地、更切合实际地实现党的各項基本政策和糾正偏差，也就是要提高我們对实现党的主張的自覺性，而不是象右派分子所希望的那样拒絕服从党的領導，否定党的主張。中国人民对共产党的信任，是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生長起来的，它是以历史和现实为根据的，是經過独立思考的，是离間不了的。当右派分子在叫囂“馬列主义和共产党妨碍独立思考”的时候，我們青年要响亮地回答他們：正是

馬克思主義和黨，給我們的思想指出正確的方向；中國青年素來以自己接受共產黨的教誨而自豪的，不聽黨的話難道聽你們反動的昏話？

總之，右派分子的“獨立思考”的外衣已經被撕破了，剩下的是赤裸裸的反黨反人民的毒素。一切受過毒害的青年，要勇敢地站出來揭發、控訴右派分子的罪行，堅決跟右派分子劃清界限。而我們廣大青年，要堅決地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服從於黨的領導，服從於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指導來進行思考。我們知道只有這樣，才有真正正確的獨立思考。

（1957年8月23日“中國青年報”社論）

党的领导问题是反右派大辩论中的一个中心问题

郑 昌

反右派的斗争和党的整风运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它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一场伟大的斗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摆事实和讲道理的大辩论，是这个斗争的方法。这个斗争很必要。革命需要辩论，一个伟大的革命，总是需要反反复复的辩论。中国的民主革命是经过长期辩论的，是经过长期酝酿使得人们有了精神准备的。从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人民中间就在不断地辩论民主革命的问题。在戊戌变法时期、辛亥革命时期、五四运动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及其失败以后的时期，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对于民主革命的问题都有过大的辩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于许多人来说，是来得比较突然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的许多问题，不是象民主革命那样，经过反复的辩论。也有过辩论，但还很不够，还需要补课。苏联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大辩论。那是一场反对反党和反社会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辩论的题目是：一国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这次辩论进行得很激烈，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斗争中使托洛茨基等人的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谬论彻底破产，从而使社会主义社会得到进一步的巩固。斯大林曾经在

一篇題为“給梅尔特的信”的文章里說：“为了否定托洛茨基及其信徒，我們，俄国的布尔什維克，发展了最激烈的原則教育运动，以維护布尔什維主义的基础，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基础，虽然根据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力量和比重来判断，我們可以不用开展这个运动。这个运动是否需要呢？一定需要的，因为在这个运动中，我們以布尔什維主义的精神教育了数十万新党员(以及非党员)。”革命所以需要辯論，因为革命必須要有統一的意志。在我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我們党的中央和毛主席曾經用了很大的力量来統一全党 and 全国人民的意志，毛主席所写的許多偉大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論”、“論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論联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等，都曾經起了統一全国人民的革命意志的偉大作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都是全民的事業，更需要意志統一。在目前，在我們国家也发生了和苏联曾經发生过的大辯論类似的全民大辯論。我們必須在辯論中取得胜利，以維护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反对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在辯論中間使广大的群众受到教育，提高觉悟，使右派分子在群众中間受到揭露、批判和孤立，在群众面前低头認罪。沒有這場辯論，或者在這場辯論中我們沒有胜利，建成社会主义就不可能。

現在的全民性的整风运动，比較我国过去进行过的一切政治运动都更为广泛。這場斗争主要是在两个方面进行，一个是在知識界，另一个是在农村。無論在知識界或者在农村，人們在斗争中的态度都划分为先进、中間、落后。这种划分不是人为的，而是各人自己采取的。“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較积极的、中間状态的和比較落后的三部分人。”(毛主席

席：“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群众中的落后分子可以在某些问题上同情右派分子，对右派的意见起共鸣，但是他们并不反对社会主义，他们并不是右派分子。无论在知识界或者在农村，广大的群众都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的。拿北京一些高等学校的情况来看，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大约是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一、二、三，就是说坚决的右派骨干分子约占百分之一，他们闹得天翻地复；给他们鼓掌、捧场、摇旗呐喊的约占百分之二、三。如果仅就教师来看，右派分子的比例就要高一些，大约要占到全体教师的百分之十。在农村，富裕的农民，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他们是农村中资本主义思想的基础，他们中间的多数人还是拥护社会主义的，真正不满意合作化制度的还是少数，但是这些不满意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数目虽然不多，势力却还不小，去年以来，农村中发生了一些所谓“闹社”的事件，闹或者鼓动闹的主要就是一些富裕中农。他们代表了农村中资本主义的方向。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的斗争，首先就要和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斗争。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资本主义或者是社会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我国的农业合作化已经在一九五七年基本完成，但是它还没有巩固，还需要一个逐步巩固的过程，这个过程大约需要五年的时间。这一次右派分子所以敢于向党向人民进攻，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看到农村合作化制度还没有巩固。他们以为满可以发动农民起来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但是他们错了，他们忘掉了事情的主要一面。合作化制度虽然还没有巩固，但是它的优越性已经显露出来。右派分子们没有看到共产党和农民的关系是不可分裂的，结果农民不是起来反对共产党，而是反对他们。

目前的反右派斗争主要是一场政治斗争，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到反右派的斗争基本结束以后，那时将转到主要是思想斗争。斗争的结果，必须达到毛主席提出的六项区别政治是非的标准中所说的六方面的目的，即是：（一）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二）加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使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巩固；（四）加强民主集中制；（五）使共产党的领导更加巩固；（六）加强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在这六个目的中间，最重要的是加强社会主义建设和加强共产党的领导，特别是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一切革命措施的实现和革命目的的达到，都无从说起。

二

在反右派的政治斗争中所辩论的中心问题，就是关于党的领导问题。

右派分子在向党向人民的疯狂进攻中，提出了许多原则问题。把这些问题归纳起来，他们在政治制度方面、政治原则方面和理论方面，主要反对的是为伟大的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所证明了的、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论述过的五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第一条是关于党。“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这个政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密切地联系群众，力求成为劳动群众的核心，并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右派分子们攻击这条真理，他们夸大党的工作中的缺点，把党形容得一团漆黑，借以否定党的领导；他们煽动群

众反党，说什么革命不一定要有党的领导，说什么“反党不是反社会主义，不是反革命”。

第二条是关于革命。“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右派分子否定革命。他们攻击我国过去进行过的五大运动，他们既否定社会主义革命，也否定民主主义革命。

第三条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在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无产阶级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右派分子们主张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恶毒地诬蔑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没有政治上的民主；他们攻击肃反，妄图否定对于反革命专政的必要和成绩。

第四条，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右派分子们不敢明目张胆地主张不要社会主义建设，他们采用否认建设成绩的办法，诬蔑“第一个五年计划搞坏了”、“统购统销糟透了”。

第五条是关于国际主义的原则。“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努力取得各国劳动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右派分子妄图削弱我国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妄图破坏我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团结。他们诽谤苏联，反对我国“一边

倒”的外交政策，故意混淆帝国主义国家、反殖民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区别，誣蔑我們发展全世界人民大团结的努力是“浪费人力、物力”。

在这五条中间，最中心的是党的领导。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主义团结，都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右派分子也了解这点，他们也知道没有了党的领导，社会主义事业就失败了。他们一面伪装“拥护社会主义”，一面集中全力反对党的领导。他们使用各种各样的语言、采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向党进攻，来反对党的领导。

三

在关于党的领导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看法和右派分子的看法根本不同。我们认为：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没有党组织的领导和共产党员的积极作用，就会使人民群众在前进的道路上失去坚强的核心。

为什么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是无产阶级而绝不能是别的阶级领导的呢？关于这一点，列宁有过很清楚的说明。列宁在一九一九年五月所写的“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中，非常概括又非常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问题。他说：“只有受过几十年反资本的罢工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教育、培养、锻炼而团结起来的那个被压迫阶级——只有领会了城市的，工业的，大资本主义的全部文化，并有决心和本领来捍卫这种文化，保存并继续发展其一切成果，把这些成果变为全人民，全劳动者都能享受的那个阶级，——只有担当得起历史所必然加在坚决排除已往、大胆开拓

將來新社会道路的人們身上的一切困苦、患難、考驗和巨大犧牲的那個階級，——只有其中优秀分子根本仇恨鄙棄一切市儈庸俗東西，根本仇恨鄙棄小資產階級、小職員和‘知識分子’中間盛行的這種惡劣品性的那個階級，——只有‘經過了劳动学校鍛煉’而善于喚取一切劳动者和一切誠實人尊敬自己劳动能力的那個階級，才能用自己的階級專政來消灭階級。”這個階級就是无產階級。列寧在這段話里用了五個“只有”，他從五個方面說明了无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區別，說明了无產階級的革命性，說明了无產階級所具備的對於革命進行領導的條件。列寧在另外一篇題為“俄国社会民主运动中的改良主义”的文章中，曾經把上面那些意思總結為一句，他說：“无產階級是現代社会中唯一徹底的革命階級，它应当做率領全体人民為實現徹底民主革命而斗争、率領所有一切被剝削劳动群众為反对压迫者剝削者而斗争的領導者。”只有无產階級才能够領導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設；資產階級不僅不能領導，而且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階級；小資產階級也不能領導，它是社会主义革命中所要改造的階級。

无產階級怎樣實現它的領導呢？只有通過共产党。這是因為：第一，黨是无產階級的先鋒隊、參謀部，它是无產階級的用馬克思主义武裝起來了的部分，只有它能够確定无產階級斗争的目標和方針；第二，黨是无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只有黨的領導才能使无產階級的斗争統一起來，沒有這種統一，就無法保證无產階級斗争的一致；第三，黨是使一切的政權組織和群众組織同无產階級聯結起來的紐帶，无產階級只有通過黨才能對那些組織實行領導，通過黨的領導就把那些組織變成為为无產階級和一切劳动群众服務的組織。關於這個問題

題，列寧也作過非常深刻的分析，他說：“只有工人階級的政
黨，即共產黨，才能聯合、教育和組織成無產階級和全體勞動
群眾的先鋒隊，也唯一只有這個先鋒隊，才能拒抗這種群眾中
不可避免的小資產階級動搖性，拒抗無產階級中工會狹隘性
或職業偏見之必然的傳統與惡習，並能夠領導全體無產階級
的一切聯合行動，亦即在政治上領導無產階級，再經過無產階
級來領導全體勞動群眾。不如此，便不能實現無產階級專政。”
（“俄國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關於黨內工團主義與無政府主義
傾向的決議草案”）

黨的領導包括政治領導、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而首先是
政治領導。除了學術理論性質的問題以外，一般情況下，政治
領導包括思想領導。關於黨的政治領導，毛主席在“中國共產
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一文中，有過極好的說明：“無產階級怎
樣經過他的政黨實現對於全國各革命階級的政治領導呢？首
先是根據歷史發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號，和為了實現這
種口號而提出關於每一發展階段和每一重大事變中的動員口
號。……作為全國人民一致行動的具體目標，沒有這種具體
目標，是無所謂政治領導的。第二，是按照這種具體目標在全
國行動起來時，無產階級，特別是它的先鋒隊——共產黨，應
該提起自己的無限的積極性和忠誠，成為實現這些目標的模
範。……第三，在不失掉確定的政治目標的原則上，建立與同
盟者的適當的關係，發展和鞏固這個同盟。第四，共產黨隊伍
的發展，思想的統一性，紀律的嚴格性。共產黨對於全國人民
的政治領導，就是由執行上述這些條件去實現的。這些條件
是保證自己的政治領導的基礎，也就是說革命獲得徹底的勝
利而不被同盟者的動搖性所破壞的基礎。”在政治目標確定

之后，就必须团结党内党外的广大群众来为实现这个目标奋斗。党的领导的正确，不但表现在政治领导的正确上，而且表现在组织领导的正确上。关于这一点，毛主席也作过很好的说明：“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这一切意见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用干部’一类。”（“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是分不开的，组织领导服从于政治领导，任何一种领导都不能只是抽象的政治领导。其实，一些企图篡夺共产党的领导的右派分子，也有自己的组织领导，他们不但要提出自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而且还要团结起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他们也要发展组织，使用干部。世界上从来没有完全没有组织领导的政治领导。

四

右派分子对于党的领导的攻击，归纳起来不外有三种说法。一种是根本否认党的领导，既否认党的政治领导，也否认党的组织领导，叫嚷所谓共产党应当和民主党派平分领导；第二种是只承认党的政治领导，否认组织领导，把党的领导作用只限于宣传教育工作；第三种是承认党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但是不承认基层组织可以领导，他们说，“中央行，基层不行。”“党正确，干部不好，党的干部政策错了。”

社会主义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来领导的国家，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条件。确定这种领导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我们的国家就是一个这样的社会主义的国家，还在这个国家建立之前，毛主席就在

“論人民民主專政”里明確地說明了我們要建立的“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农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我國憲法的第一條也明確地規定了這個領導。右派分子所提出的所謂反對“黨天下”，要共產黨“下台”，讓各黨派“輪流執政”，就是要否定憲法所規定的國家制度。所謂“黨天下”的內容，就是污蔑黨對國家的領導是“清一色的局面”。這當然是胡說，是違反事實的。事實是我們的政權部門廣泛地吸收了工人階級以外的其他階級、其他黨派和無黨派的人士參加，在我國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非共產黨員的代表將近一半，在最高國家行政機關國務院的組成人員中，共產黨以外的人士占了四分之一，這怎麼叫做“清一色”呢？我們從來就是主張同黨外人士協同辦事，毛主席常常教育我們“要學會打開大門和黨外人士民主合作”，我們黨歷來反對排斥非黨人員的宗派主義。但是我們主張無產階級不能和其他階級分掌政權的領導。任何政黨都是實現一定的階級的利益和主張的工具。社會主義只能依靠無產階級領導才能建成，只有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才能領導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無產階級一定要同廣大的非無產階級群眾聯合，也要團結使用一切願意同勞動人民一起建設社會主義的專家和知識分子，但是政權的領導必須獨掌。這一點不能有任何含糊。右派分子們叫嚷的共產黨“下台”，各黨派“輪流執政”，不過是要以資產階級的專政來代替無產階級專政，以資產階級政黨來篡奪無產階級政黨的國家領導。

右派分子攻擊黨的領導的另一個手法，是反對黨的組織領導，否認黨在機關、學校、團體、企業中的領導，要求取消黨在一些基層單位(特別是高等學校和新聞出版機關)的領導。

他們搬出的最主要的“理由”是“外行不能領導內行”，說共產黨在科學、工程技術、文教衛生等等方面都是“外行”，應當把領導權交給“內行”，即是交給右派分子。這當然也是胡說，是違反事實的。黨的領導首先是政治領導，這不能和單純技術方面的領導混淆起來，黨的領導不是說包辦一切，對於技術性的問題，黨可以而且不應該多加干涉。但任何工作首先都有個方針政策問題，即首先要解決為什麼人服務、怎樣服務的問題，這是任何一個工作的靈魂。沒有這一點，任何工作都是盲目的。如果總的方向錯了，工作越是積極，對人民越會不利。方針政策就象打槍的准心，不要准心，只會亂打。黨的領導的正確，表現在：政策路線的正確、組織工作的保證和思想工作的正確。在這些方面，沒有人敢說黨是“外行”。幾年來的事實證明，黨通過方針政策，通過計劃、組織和思想工作，是能夠領導一切工作的，而且領導得很不壞。就目前的狀況來說，我們對於自然科學還比較生疏，因此在某些技術範圍的問題上，我們還不能完全領導。但是，我們對於自己所不懂的事情，決不會安於作外行，黨正在組織大批的黨員和團員鑽研自然科學。總之，黨能領導一切工作。中國的歷史證明，我們黨勝利地領導了階級鬥爭，也勝利地領導了經濟建設。在一定的時期之後，黨一定能夠完全學會領導向自然界的鬥爭。

叫囂“黨正確，幹部不好”，“中央行，基層不行”，這是右派分子攻擊黨的領導的又一很陰險的手法，他們從一個個的單位來否定黨的領導，使黨的領導成為抽象的東西。他們叫囂黨外人士“有職無權”，黨的幹部都不稱職，“黨的幹部政策錯了”，“重德不重才”，等等。這當然也是胡說，是違反事實的。在我們的國家機關、企業、團體、學校中，黨的組織和黨員的

活动,对于贯彻党和政府的政策,推动工作前进,起着决定的作用。我国巨大的建设成就,是和各个基层组织中的党的组织所起的组织和保证作用分不开的。我们的基层干部,就全国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好的。我们的百分之六十左右的干部,都是联系群众,勤勤恳恳、忠心耿耿地为人民的事业服务的;另外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干部,在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上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缺点,例如简单化,命令主义,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工作中不走或者不会走群众路线,忙于事务,接近群众太少,等等;但是总的方面还是好的。右派分子抓住个别的人、个别的错误加以夸大,来攻击党的基层组织,一些中间状态的人往往在这个问题上被迷惑,他们不懂得看一个人应当分别他的主流和支流,主流是总的方向。就主流看,我们的基层干部百分之九十在立场上、在为服务的观点上都是好的,作风上的毛病这只是他们的支流;不能看到支流就激愤起来,把它渲染成为主流。右派分子有意夸大我们基层干部的支流而抹杀主流。我们的许多干部是有缺点的,我们党的坚强和伟大正是在于毫不宽容本身和自己成员的过失,不断地采用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来揭发错误和纠正错误,党所号召的整风,就是这种对于人民事业严肃负责的态度具体表现。但是我们一方面要整风,整掉我们干部身上的缺点;另一方面又要保护干部,只要他基本是好的就要加以保护,象树木一样,只要成为了树就要保护,只能修枝剪叶,不能伤到树干。右派分子咒骂我们的干部政策是“只重德不重才”,说什么不应当重德,应当“不拘一格用人才”,这是根本错误的。这几年来,党所领导的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发展,而这些工作都是人做的,这就证明了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的完全正确。

为了保証无产阶级的领导，为了把人民的事业掌握在可靠的干部的手里，我们的国家必須有自己的用人的标准，这就是我国宪法上所規定的“效忠人民民主制度，服从宪法和法律，努力为人民服务”。其实，任何国家任何政党都有自己选拔干部的标准，世界上没有一个不講“德”的国家，只是德的标准不同而已。右派分子攻击我們的干部政策，不过是为了削弱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便于资产阶级的篡夺和复辟。

在关于党的领导的許多問題上，右派分子和我們的看法完全不同。这是由于彼此的立場不同。反对右派的斗争是一场劇烈的维护党的领导权的斗争，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维护党的领导就是维护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国人民的革命經驗一再証明，只有在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取得革命和建設的胜利。反对或者削弱党的领导，实际上就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反对党就是反对革命。以实际行动来维护党的领导，彻底粉碎右派分子的进攻，这是保卫社会主义事业的必要的斗争，这是我們的責任。

(原載“中国青年”1957年第18期)

論党领导的人民天下

王 力

什么叫天下呢？天下，就是政权。今日之域中，究屬誰家的天下？答案原来是很清楚的：今天中国的天下，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天下，也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也就是无产阶级專政的政权。这是中国人民选择的政治制度，这是中国历史做定了的結論。

这个政治制度好不好呢？在这次“大鳴大放大爭”当中，真称得起是举行了一次全民大辯論，也可說是举行了一次全民投票，全国人民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絕大多数人都說：这个制度好得很！而只有极少数的右派分子反对这个政治制度，他們所向往的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但是右派分子自己也知道，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早已破了产。因此，他們不敢公开提出反对人民民主專政、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口号，他們只好改头換面，变成兩面派，一方面假裝并不反对人民民主專政，一方面处心积虑，字斟句酌，选择了“反对党天下”这个口号，他們以为这样来一个偷天換日，就可以达到反对人民民主專政的目的。

爭天下，夺政权，这就是右派分子挑动这一場政治斗争的目的。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的天下呢，还是要右派领导的反人民的天下呢？我們說：人民民主專政的制度好得很；右派說：西方民主制度好得很。这是兩条道路的斗争，这是一个最

根本的分歧。

我們認為我們的國家制度是最新式的民主制度，是高度民主與高度的集中的結合。這種制度比起任何式樣的西方民主制度來，是民主得不可比擬的。這個道理在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以及毛主席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有名的著作里，都作過精辟的闡述。毛主席宣告過：“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當然，對右派來講，他們是根本不聽共產黨的話的。右派自命為西方民主的布道師，他們豈肯拋棄自己的使命。但是，他們哪里有一點兒新鮮貨色呢？他們只能當一個打小鼓、收舊貨的，挑着滿筐子不知是從哪一世紀、從哪一國收羅來的“民主古董”，以此來招搖撞騙。其實拿收舊貨來作比喻，還是恭維了他們。因為舊貨十之八九還是可以利用的，而他們販賣的“資產階級民主”的舊貨，却十分之九毫無用處，那十分之一的“遮羞布”，也必須加以徹底批判改造，或者從反面去理解它，才能够變成有用的東西。正如列寧所說的，西方式的“民主制”越健全，就越便利於壟斷資本家操縱，“遮羞布”也就越來越用不着了。而在第二次世界戰爭以後的美國，還有別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正好象是脫衣舞的演員，終於脫得一絲不掛了。在中國來充當西方民主的舊貨販子，本來的命運就是可悲的，而今的晚景，就更加淒涼了。既沒有貨源，市場的情況又不佳，那就只好拿出變魔術的本領，翻翻舊箱底，賣弄一下玄虛，叫一聲“變”，於是出現了“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員

会”、“輪流执政”等类的东西，硬要人們相信这些东西是今天中国政治制度中所缺少的东西。其实明眼人一看便知，还不是那一套支离破碎的旧貨！

今天右派分子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口头上并不承認他們是要改朝換代，走資本主义道路的，他們說：“我也是贊成社会主义的，只是要求把无产阶级專政制度改良一下而已。”那末，这是真贊成社会主义嗎？只不过是騙人的鬼話。右派分子一切有关“党天下”的謬論，归根結底，就是集中于反对无产阶级專政，而无产阶级專政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志，反对无产阶级專政，就是反对社会主义。不要无产阶级專政，就不能叫做社会主义，而只能叫别的什么主义，叫資本主义、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或者叫假社会主义，叫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封建阶级的“社会主义”、法西斯的国家“社会主义”等等。在今日的中国，就只能把这些叫作反革命复辟。真社会主义者和假社会主义者的根本分歧之点，馬列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学說的根本分歧之点，馬列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根本分歧之点，我們和右派分子的根本分歧之点，都是在要不要无产阶级專政这个問題上。

我們和右派分子的这一場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右派分子爭夺天下的阴谋也并不是偶然的。对于許多右派分子來說，他們是蓄意已久的。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們就是所謂“中間路綫”的倡导者，他們就策划着爭夺天下。他們的棋是怎样下的呢？第一着是希望蔣家天下改良；第二着是希望美国人买“民主个人主义者这匹馬”，由他們来一統天下；第三着是希望三分天下；第四着，如果万不得已，共产党得了势，他們也希望把无产阶级專政制度“改良”一下，使之成为西方民主制度。拿

他們的話來說就叫做“把社会主义的經濟民主加上西方的政治民主”。偏偏天不如人愿，解放战争胜利竟势如破竹，迅雷不及掩耳，第四着棋也来不及下了。解放后，又接二连三地来了个五大运动，三大改造，以狂风扫落叶的姿态，把一切阻擋新制度成長的努力，摧枯拉朽，送进了坟墓。这些先生們吓得目瞪口呆，举棋不定，等到被人民的欢騰声惊醒的时候，睁开眼睛一看，原来天下大变了，原来社会主义革命已經在經濟战綫上取得决定性胜利了。痛定思痛，岂肯罢休，当他們認為“时机”到来的时候，他們怎能忘記要下这第四着棋，要和共产党决一雌雄呢？

当然，必須指出，过去热心于中間路綫的人們有的已經逐漸拋棄了这种立場，真心誠意地拥护人民民主專政了；大多数人也傾向于拥护人民民主專政了；而只有少数右派分子如章伯鈞、罗隆基、儲安平之流，死抱着这个立場不变，至今仍然坚决反对人民民主專政。

右派分子反对人民民主專政的鋒芒，是集中在反对共产党的領導权上面。但是人們知道，人民民主專政和共产党的領導权是不可分离的。沒有共产党的領導权，人民民主專政，或是无产階級專政就变成一句空話。現代国家的一切階級，通常是由政党領導的，政党通常是階級中挑选出来的代表人物組成的，工人階級的領導权，当然必須通过共产党的領導来实现。推翻共产党的領導，也就是推翻人民民主專政。正如苏联十月革命后叛乱分子提出一个口号“贊成苏維埃，只是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維埃”，今天的右派和当时苏維埃政权的叛乱分子好象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区别仅仅在于今天的右派不敢直接了当地提出不要共产党的領導，而是又变了一个

花样。他們先把党的領導权污蔑为“党天下”，然后便大加口誅笔伐鳴鼓而攻之。

为了反对共产党的領導权，右派分子通用的第一个說法是：“你們清一色”、“你們統治一切”，比如儲安平就說：“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組，都要安排一个黨員做头儿，事无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点了头才算数……。”且不講这种說法根本不符合事实，許多單位的“头儿”并不是共产党员，而且根本的問題是，共产党员無論被安排在任何一个崗位上，他并不是騎在人民头上做“官”，而是为人民服务，作人民的勤务員。虽然他們身上可能存在着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污垢，但是他們是时时刻刻在“扫地洗臉”，努力克服自己的缺点，任何私心和共产党员的要求都是不相容的。这种人多一点又有什么坏处呢？从人民的利益来看，今天的問題不是共产党領導得多了，而是領導得还不够。有些單位，特别是有些文教科学事业單位的領導权，还掌握在右派分子手里，他們和共产党是兩条心，共产党對他們根本沒有領導权。还有一些單位，共产党的領導权还不巩固，有些人对共产党还是半条心，还有时候容易上右派的当。也还有一些單位，共产党的領導至今還沒有建立。这种情况說明共产党的領導还必須大大加强。

右派說是反对“清一色”，实际上是反对“一色”，就是反对紅色，而企图建立白色的清一色。中国人民为了巩固紅色的領導权，为了建成社会主义，迫切需要大量培养紅色專家和領導人才。我們很有信心地說，紅色專家的队伍，即工人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队伍是終將會建立起来的。我們也相信，今天对工人階級半条心的人，絕大多数是会逐步变成一条心的人，

这也就变成了紅色。当然右派分子的去从，决定于他們自己，但只要幡然悔悟，重新作人，也是可能逐步变为一条心或半条心的人的。建立工人阶级知識分子队伍这个偉大的历史任务的完成，还需要中国人民进行長期艰苦的奋斗。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人民才能自豪地說：紅色專家的队伍終于建立起来了。党的領導权巩固了，人民民主制度巩固了，社会主义建成了！即使到了那种局面，恐怕也很难做到清一色，因为总还有极少数至死不肯改变顏色的人，只好讓他們把白色的反动观点和自己一起帶进棺材。

为了反对共产党的領導权，右派分子通用的第二个說法是：“你們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事实上，在我国，共产党和政权是分得很清楚的；共产党和軍隊，和經濟机关，和文化机关，和人民团体，也是分得很清楚的；它們都有各自的独立系統，从来沒有人說过，要用共产党去代替政权，代替其他的一切組織。很清楚，右派攻击我們“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实际上就是反对共产党領導政权，他們想把共产党和政权完全分家。我們認為，共产党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核心，在总政策总路綫方面，在工作方針方面，在行动方向方面，“党政不分”，溶成一片，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如果党政分了家，那倒是錯誤的，危險的。但即使如此，人民民主專政还是經過政权来实现的。共产党不是越过政权，而是經過政权来实现对国家的管理的。党組織不應該包办代替行政工作，不应直接干預政府的具体业务工作。但是，正如周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过的：党对于人民群众直接发出政治上的号召和政策性的决定；有些帶有政治号召和政策指示性質的决定或帶有群众运动性質、需要党政一齐动手的工作指示，由同級党政机

关联合发布；以及党政机关在一些工作上必要的联合和配合，过去証明是有好处的，今后当然还应当繼續进行，这难道还有什么疑問嗎？

为了反对共产党的領導权，右派分子通用的第三个說法是：“你們只要我們扛旗打傘。”人們知道：人民民主專政不但需要无产階級及其政党的堅強領導，而且还需要无产階級和广大的人民群眾結成巩固的联盟。这个联盟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今天包括着“一切贊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階級、阶层和社会集团”。誰都知道，許多非党人士在我們国家机关中担任着重要职务，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額中，非党人士占到40%以上。这能叫“扛旗打傘”嗎？当然不能这样說。但是資产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确沒有抓到对国家的領導权，而且也不應該有这种領導权。为什么呢？这是中国資产階級的社会經濟地位決定了的。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的民族資产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就不能充当革命的領導者，不能够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而今社会主义革命已經在經濟战綫上取得决定性胜利，資产階級正处于消灭的过程中，資产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反而应当掌握領導权，反而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世界上竟有如此奇怪的邏輯嗎？当然，右派分子是一直不甘心居于“次要”地位的，他們不管如何已經身居要职，只要是掌握不到全国政权的領導权，总是填不滿他們的欲坑的。他們就說“这是扛旗打傘”。好吧，就算是“扛旗打傘”，你們不愿意为人民“扛旗打傘”，难道你們愿意重新再給帝国主义和蔣介石“扛旗打傘”嗎？我們認為，当資产階級为帝国主义、蔣介石“扛旗打傘”的时候，这才是他們的可耻的黑暗的时代；而为人民“扛旗打傘”的时候，正是中

國資產階級光榮的光明的時代。第三條道路過去走不通，今後也永遠走不通，除了極少數右派分子之外，連資產階級中的大多數人也拒絕走這條路了。這難道不是歷史的結論嗎！

為了反對共產黨的領導權，右派分子通用的第四個說法是：“你們獨攬用人權”，“你們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在機關團體中出現的右派分子，幾乎都是集中力量攻擊共產黨領導的人事制度，他們說：“這是黨天下的具體表現”。人們知道，什麼叫領導？毛主席曾經通俗地規定為：出主意，用幹部。既然承認共產黨的領導權，為什麼偏偏要反對共產黨的用人權呢？很明顯，堅決反對共產黨用人權，也就是堅決反對共產黨的領導權。為了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制度，為了保證共產黨的政治路線得到貫徹，實現黨對國家政權的領導，共產黨必須掌握用人權。

“交出”用人權，這是歷史上一切階級專政的政權所絕不能容忍的。請看匈牙利事件的教訓：反革命在十月事件以前就惡意地誇大人事部門的缺點，把它說成是多余的、官僚主義的機構，並且建議取消人事部門。到十月事件期間，人事部門真的被取消了，人事幹部大批地被開除並受到迫害。同時反動派執行了他們自己的幹部政策，把許多共產黨員和進步分子從領導職位排除出去，而讓他們自己的人占據領導職位。這樣，政權也就改變為反革命性質了。中國的右派分子，在大鳴大放期間，不是也在跃跃欲試地想步匈牙利反革命分子的后塵嗎？

共產黨是必須掌握用人權的，但不是“獨攬”。共產黨是忠實於統一戰線政策的，是誠懇地和黨外人士合作的，是主張黨外人士有職有權的。這個“權”字，當然也包括用人權在內。

但是，任何人掌握着这个“权”，党员也好，非党员也好，都不是私人财产，都要受国家的干部政策和人事制度的约束。任何人的用人权，不能有随意任用反革命分子之权；不能有随意任用反对社会主义分子之权；不能有随意任用私人之权。否则，我们国家的性质岂不是要变质？

从我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基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的朝代来说，这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改朝换代。但是今天的“天子”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工人阶级没有任何私心，对待任何别的阶级出身的人，只要不是敌视、破坏社会主义的敌人，都包括在人民的范围之内；他们只要抛弃自己原来的立场，便都可以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这种阶级界限的消灭，正是工人阶级历史的使命，哪里谈得到“一朝天子一朝臣”？但是如果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工人阶级应该建立本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那也仅仅说对了一半。因为在工人阶级的队伍中，是欢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过改造以后参加进来的，事实上今天有许多人已经称得起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用人权关系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前途，关系到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巩固的命运，因而更必须紧紧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紧紧掌握在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民群众手里，而绝不允许为右派分子所篡夺！

事情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和右派的根本分歧，我们和右派斗争的中心内容，就是争的“天下谁属”的问题。我们是为人民争天下，而右派分子是为资产阶级争天下。他们这次和共产党较量的结果是失败了。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一有机会，还是会兴妖作怪的，因此必须准备进行长期的斗争。我们应当重视这一场斗争，因为这一场斗争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

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关系全国人民的命运的。为了巩固这一場斗争的胜利成果,从思想上把这个问题搞深搞透,是十分重要的。

(原载 1957 年 9 月 5 日“中国青年报”)

共产党能够领导科学、文化和教育工作

安子文

2月23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演。这篇讲演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阐明了我国在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所面临的一系列的根本问题，系统地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透彻地说明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接着开始了党的整风运动。最近一个时期，我国的政治生活特别活跃起来了。一方面人民群众对于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积极的批评和建议，对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有极大的帮助。另一方面，某些对社会主义事业心怀不满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竭力利用党所提出的口号，来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这种情况，也同样出现在科学、文化和教育工作的领域内。在科学、文化和教育方面，在这次大鸣大放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共产党能不能够领导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的问題。参加鸣放的大多数人认为党是应该而且能够领导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的。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党不能领导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他们认为党的领导妨碍了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限制了知识分子的“自由”，因此，发出了“民主办校”“党退出学校”以及“党是外行，不能领导科学”的论调。这些论调的实质是企图削弱或者取消党在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方面的领导。自然，提出这些意见的人

的情况是不相同的,除了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小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企图篡夺党在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方面的领导权以外,大多数人是由于在思想上存在着片面性,他们把党对于国家各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的领导问题同单纯技术方面的问题混淆起来,他们认为党对于这些工作的技术业务还是外行,因而就不能领导这些工作。我们说,必须肯定,党应该而且能够领导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仅不应该削弱或者取消党的领导,相反地,应该加强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顺利发展的保证。

为什么说党是能够领导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呢?党的领导的力量何在呢?党又是怎样领导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呢?我们说:党主要是在政治、思想、方针、政策上、工作规划和人事安排等方面,对科学、文化和教育工作进行领导的。党的领导的力量在于它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工作经验,善于把全国人民的智慧集中起来,并且把这种智慧表现为统一的意志和有纪律的行动。

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底发展规律的科学,它适用于一切领域。由于党具有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从而也就能够正确地掌握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规律,领导国家各个方面的工作。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指出:“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个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全体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

有組織的、有計劃的、統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个組成部分。”(着重点是作者加的)这句话虽然是对文学事业講的,但是,同样的也适用于科学和教育事业。既然社会主义这个机器是只有领导全国政权的、能識別前进方向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才能开动的,那么,做为这个机器的齿輪和螺絲釘的科学、文化和教育工作,自然也就必須由党来领导。党对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的领导,是通过国家計劃来实现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主义的經濟是有計劃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也是有計劃的,是为社会主义經濟建設服务的。因此,党就可以按照“統籌兼顧,适当安排”的原則,根据目前国家經濟建設的需要和現有的人力、物力、財力提出科学、文化、教育工作的任务和实施方案,做出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划。事实上,在1956年,党已經领导科学家完成了发展我国科学研究的十二年远景规划。这个巨大的规划草案,詳尽地規定了科学研究的方針、任务、研究的中心問題和进行研究的各种步驟以及保証的条件。这个偉大的规划本身,就充分說明了党是完全能够领导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在科学高度專業化的今天,要全面建設,还要在比較短的时期內建設的好,沒有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

党一向是对科学、文化、教育工作采取正确的方針和政策的。党积极地貫徹执行了对知識分子的团結、教育、改造政策。党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工作者树立科学为人民服务的宇宙觀,帮助他們学习和掌握馬克思列宁主义,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点,使他們懂得理論与实际相結合,知識分子与工农相結合的重要性,使他們由资产阶级的知識分子轉变为无产阶级的知識分子,由为旧社会服务轉变为新社会服务。在社会主义

改造基本完成和知識分子經過了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基礎上，去年，黨又提出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對於學術問題，我們黨從來是主張不能用行政命令進行干涉，而是主張通過科學、文化界的自由爭論和客觀實踐來解決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是促進藝術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是用耐心說理的方法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方針。這一方針，鼓勵了科學、文化、教育工作者的獨立思考和自由討論，進一步發揮了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推動了科學、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

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最根本的領導方法。象領導任何其他工作一樣，黨在對科學、文化、教育事業進行領導時，也是貫徹執行了群眾路線的。在這方面，黨主要是採取廣泛地團結黨內外的新老科學、文化、教育工作者的方法，依靠和通過他們，對科學、文化和教育事業進行領導。幾年來，黨一方面抽調了大批黨員到科學、文化、教育工作崗位上去工作。他們之中有一部分人已經掌握了科學、文化和教育工作的基本規律，也就是說已經鑽了進去，變成了內行，能夠勝任現在的工作；也有少數人由於各種原因，不適合或不完全適合擔任現在的工作，對於這些人，黨準備進行適當地調整；同時黨已經確定大力培養訓練新的科學、文化、教育工作者，並且準備挑選一批優秀的黨員幹部去加強這方面的工作。另一方面，為了更有效地實現黨對科學、文化、教育事業的具體領導，黨將在知識分子中繼續進行接收黨員的工作。現在在知識分子中開展接收黨員的工作是比過去有了更好的條件。這一方面是由於黨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提出後，我國廣大的知識界已經呈現出一種新的氣象；另一方面也是由於經過幾年來的

工作、学习和各种运动，广大的知识分子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通过科学的实践，他们绝大部分人是赞成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具备了共产党员的条件。根据知识分子队伍的这种情况，我们将继续采取积极的、慎重的态度把那些有学问、有技术、愿意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积极地要求入党并且具备了共产党员条件的科学、文化、教育工作者接收到党内来，培养他们成为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中的领导骨干，通过他们来加强党对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的领导。

这就是为什么說我们党能够领导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的理由，这就是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领导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力量所在。那么，再讓我們看一看党对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领导的实际结果怎么样吧。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是发展了呢，还是后退了呢？回答是发展了。事实是最好的证明：解放后几年来，知识分子的数量上有了很大的扩大，仅就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卫生、文化艺术等五个方面的知识分子的数量来看，即已有近四百万人，高级知识分子较解放前增加了三分之一左右。全国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巨大的发展，无论在人员、机构、经费或者是设备方面，都比国民党时代大得多。同时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还集中表现在经济建设的成果上，以钢的产量来说，1949年年产只有十几万吨，现在已经达到了年产四百五十万吨；旧中国除了少量的轻工业而外，几乎没有重工业，而现在我们在苏联的帮助下，已经建立起旧中国所没有的机器制造业、飞机和汽车制造业；我们还修建了六千三百公里的铁路，

完成了荆江分洪、治淮工程；建立了鞍鋼、武鋼、包鋼等巨大的鋼鐵基地；建筑了工程浩大的長江大桥。在科学技术水平方面，也是国民党时代所不能比拟的。在苏联帮助下，我們在今年內將基本建成功率七千瓩的重型原子反应堆和能产生二千五百万电子伏的X粒子的回旋加速器。这些都无可爭辯地說明了党不但是能够領導科学、文化、教育事业，而且能够領導得好。所謂“党的領導妨碍了知識分子的自由”，“党的領導妨碍了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等濫調，是毫无事实根据的。

自然，党对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領導还是有缺点的。主要的是我們党内有許多同志还不善于团結知識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們，不尊重他們的劳动，不虛心向他們学习，不适当地干預那些不应当干預的事务。同时，在我們党的干部中，有很多人的科学文化水平还是不高的，因此，实现党对科学、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領導还是存在着一定困难的。这些缺点和困难已經引起了党的注意。我們相信，通过这次整风运动，我們党將會逐步地克服这些缺点，不断地总结工作經驗，改进我們在这方面的的工作，提高我們对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領導水平。这里，重要的問題还在于善于学习。我們党的干部在过去很長的时间內主要是搞阶级斗争，沒有時間也沒有条件来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因此，我們党的干部在科学技术知識方面是很不够的。但是，我們不应当安于現狀，应当努力刻苦地学习。既然我們能够学会阶级斗争，我們也就能够学会科学技术。本事都是学来的，不是生而知之的。現在我們的学习条件已經比过去优越得多，只要我們踏踏实实、虛心勤懇地学习，在一定的时期內，我們將一定能够攻破科学这个

堡壘，逐步地掌握科學技術知識，由外行變成內行。

過去，我們黨主要是從政治思想、方針政策、工作規劃、人事安排和工作條件等方面對科學、文化、教育事業進行了領導，並且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績，那麼，今後，當我們大批的黨員掌握了科學技術知識，大批的優秀的科學、文化、教育工作者參加到我們黨內來，同時我們又能夠緊密地團結廣大的黨外科學、文化、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我們黨就將不僅主要是能夠在政治思想、方針政策、工作規劃和人事安排上對科學、文化、教育工作進行領導，而且能夠在業務技術上對科學、文化、教育工作進行具體領導。我們相信，在黨的正確領導下，我國的科學、文化、教育工作，將在比較短的時期內，取得更加巨大的成就。

(原載“中國青年”1957年13期)

論社会主义的內行

王 力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陰謀奪取政權，他們首先企圖奪取國家的文教科學事業的領導權。他們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口號，叫“外行不能領導內行”。這就是說，在文教科學事業當中，共產黨是外行，右派分子是內行，共產黨應該讓位給右派分子來領導。這個口號曾經成為右派分子的行動綱領，並且曾經迷惑了一些人。

是的，共產黨人是老實人，是謙虛的人，對於擺在自己面前的新事物，總是抱着學習的態度，總是說：我們還是外行，我們還是小學生。但同時共產黨人也從不畏懼攀登任何險夷的高峰，在任何關係祖國命運的崗位上從不放棄自己的領導責任。誰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那是無論如何辦不到的。這是一個大是大非問題，我們需要和右派分子爭辯得清清楚楚。

在今天中國社會上，究竟有多少“行”呢？俗話說“三百六十行”，只不過是言其多也。特別是現代科學很發達，分工很細密，有的一個科學部門，可能就不止三百六十行。但是，千行萬行，總不外乎四件事：做工、種田、打仗和辦事，而所有辦事的又不外乎為做工、種田或打仗服務。所有辦的這些事情，在今天的中國，可歸入一大行，這一大行就叫做辦社會主義，說得完全一些，叫做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建設成功了，將來還要建設共產主義。一切的社会分工，都是在这个大行中

的小行，任何小行都是不能离开这个大行的。任何人办大学，不能忘记办的是社会主义的大学，不是办的资本主义的大学；办科学研究所，是社会主义的科学研究所，不是资本主义的科学研究所；办出版社，是社会主义的出版社，不是资本主义的出版社……。不会办大学、办科学研究所、办出版社固然是外行，而不会办社会主义，却是更大的外行。过去人们嘲弄过蒋介石，说他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姑且不论蒋介石对内战是不是真正称得起内行，他总还是十八般兵器都可以掄一下，而一到了帝国主义面前，却一样也提不动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原来这里边有一个政治原因，因为他干的專行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对反帝就不能不成为外行。同样的道理，社会主义这一大行，是共产党内行呢，还是反对社会主义的章伯鈞、罗隆基、錢偉長、曾昭掄这些右派分子内行呢？明眼人一看就很清楚，只有这些右派分子才称得起是十足的外行。

科学有兩大門，一門叫社会科学，一門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是一門大科学，講階級斗争，講无产阶级專政，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称得起是真正的科学家，那些企图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右派分子，只会一派胡言乱語，摆一摆杂货攤子。中国历史已經給他們做了結論，証明他們的那一套早已破产了。可惜的仅仅是因为他們的論点实在“不值一駁”，因而过去輕輕地放过了它，今天他們竟然还能画皮害人。就拿自然科学來說，八年来在共产党领导下，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組織人与自然界的斗争方面，已經創造了許多奇迹，做了許多我們前人所沒有做过的事情，几年来的科学事业的发展，已經賽过了以往年代的几十年、几百年。当然由于中国近代科学文化落后得太远了，中国的反动統治者遺留給中国人民的科学文

化遺產實在是太可憐了，許多重要的科學研究部門，重要的工業部門，過去不僅是落后的問題，而是根本沒有建立的問題，這種情況正是說明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的科學文化事業才有飛躍發展的可能，才有迅速趕上世界先進強國的可能。雖然自然科學本身是沒有階級性的，但是對於自然科學家來說，却有一個世界觀問題，有一個為誰服務的問題；自然科學部門也有一個政治方向的問題。今天我國一切的自然科學部門，無論是原子學、電子學、力學，也無論是原子反應堆、噴氣機，以至研究天上的天文學、研究地下的地質學，都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一部分，都是社會主義這一大行中的小行，那麼，它要不要共產黨領導呢？結論當然是肯定的。右派之所以不要共產黨領導科學，其本意實在是不要社會主義。

人們常說，“隔行如隔山”，任何一個內行，隔了行便是外行，不管任何一行的專家，他都不可能行行精通。如果按照右派分子“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理論，豈不是說，各行搞各行的，各人搞各人的，而根本不必要什麼領導了嗎？事實並不如此，右派分子自己正要黃袍加身，自封為領導，這就更加拆穿了個中底細。他們說共產黨不懂科學，不能領導，難道章伯鈞懂得那一門科學嗎？他却來了一個“六、六、六”，6月6日，召集六教授開會，不但要恢復資產階級的社会學，而且要奪取整個科學事業的領導權。更可笑的是，誰人不知章伯鈞和李伯球並不懂得京戲，雖然他們在中國社會上扮演了謀朝篡位的好雄角色，在耍流氓時活象打漁殺家裏的教師爺，但是他們畢竟是生、旦、淨、丑一樣都不會唱，豈不是外行！然而他們却舉起“共產黨外行”的旗幟，到中國京劇院放火，要趕走共產黨的

領導。章伯鈞和羅隆基並不是丹青妙手，却要奪取國畫院的領導；章羅們並不懂岐黃之術，却要奪取中醫的領導，不懂得開刀，却要奪取醫院的領導；不會唱歌，却要奪取音樂界的領導；不會演電影，却要奪取電影界的領導；不會演話劇，却要奪取藝術劇院的領導……。這就更加說明了右派所提出來的所謂“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只不過是說在各行各業中，右派分子要取共產黨的領導而代之而已。

右派分子常常大言不慚地自比為諸葛亮，並且反對“三個臭皮匠，頂一個諸葛亮”的說法，他們說今天臭皮匠根本沒有用，共產黨就是“臭皮匠”，應當走開了。其實，諸葛亮這個例子，正說明了右派分子道理的反面。首先應該說明，諸葛亮的作用，在舊的歷史中是被誇大了的，但是即使如此，諸葛亮也還是離不開劉備的領導和關、張、趙、馬、黃，五虎大將的神勇，更不用說人民群眾的作用了。何況諸葛亮本身就是一個卓越的政治家。劉備之所以重用諸葛亮，首要的也是政治原因，如果象魏延那樣，雖然有才，但是腦后有反骨，那又有什麼用處呢？今天誰要當諸葛亮很好，首先就要真正對人民的天下忠心耿耿，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但是還要有一條，工人階級可不是阿斗，共產黨還是一定要領導諸葛亮的。如果根本不接受共產黨領導的，要取而代之的，那只能叫魏延，而不能叫諸葛亮。

為什麼右派把鋒芒放到奪取文教科學事業的領導權上面呢？這是因為我國在經濟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即改變生產資料所有制的革命）剛剛基本上取得勝利，還是不鞏固的，社會主義社會現在還沒有建成。為了建成社會主義，還必須有比較充分的物質基礎，必須組織一支廣大的工人階級的知

識分子的队伍，工人階級必須有自己的技術幹部，必須有自己的教授、教員、科學家、新聞記者、文學家、藝術家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队伍。就在這個時候，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提出：这个队伍應該由他們包辦，因為他們是內行，工人階級應該滾蛋，因為是外行。這是什麼用心呢？很明顯的是為了奪取對知識分子的領導權，企圖組織一支資本主義的知識分子的队伍，進而改變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政治方向，企圖在我國實行反革命復辟。

但是右派的攻擊也就更加提起了我們的注意，我們的确還缺乏一支宏大的工人階級自己的內行的知識分子队伍，還需要迅速建立這樣一支队伍。所謂內行，是指真內行，不是假內行，是真知識分子，不是假知識分子，是完全的知識分子，不是半知識分子。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首要條件，是要具有工人階級思想，反對資產階級思想，善於區別哪些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所需要的東西，哪些是資本主義所需要的東西，而能批判地對待人類所創造的知識寶藏。這是歷史向我們提出的偉大任務。本來，對於知識分子說來應該是一個很大的鼓舞。應當看到，對於一部分已經具有工人階級思想感情的知識分子說來，他們和工人階級已經不分你我，根本也就不產生“你”是內行或是“我”是內行的問題，大家都是不同崗位上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在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紀律又有自由，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社會里，有一分熱，發一分光。至於那些對共產黨還不心服的知識分子，他們和工人階級思想感情還有着或長或短的距离，還分你我，對新社會還不習慣，一有風吹草動，有的人還神魂不安，心里頭七上八下，他們對“外行不能領導內行”之類的話可能也很

欣賞，但是其中的大多數人並不是和共產黨誓不兩立，他們如果有真才實學，有一技之長，只要愛國守法，誠實勞動，還是可以為社會主義祖國有所貢獻的。事實證明他們還在不同程度上，傾向於接受社會主義道路和無產階級的領導的，既然有了這種傾向，他們是可能逐漸拋棄資產階級的立場，站到無產階級方面來，他們在經過改造以後，也可以成為真正站穩工人階級立場的知識分子，也只有如此，他們才真正成為各行各業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內行人。至於堅決和共產黨站在敵對地位，有你就無我，有我就無你的，那是極少數右派分子。他們中間有一種人，要效法伯夷、叔齊餓死在首陽山上，雖然還沒有一個右派分子“不食社會主義之粟”，但不為社會主義出一謀的決心是下定了的；而另外一種人就更凶了，他們還要殺共產黨人。請問對這種人，如果死不悔改，即使真是所謂“內行”，又怎麼能讓他們來領導呢？反過來講，對這種人，無論共產黨如何內行，又怎麼能領導得了他們呢？根本是兩條心，也就根本不產生誰領導誰的問題了。

當右派分子拿“外行不能領導內行”這句話來向共產黨進攻的時候，我們有的同志也被它唬住了，有的也就產生了不敢領導的心理。當然羅，如果我們對某一行的確是外行，應當承認這是我們的弱點。但是，只要是黨和國家交給我們的任務，我們就應當當仁不讓，理直氣壯地擔負起領導的責任。對於共產黨人來說，領導人們團結一致走社會主義道路，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實行民主集中制，一般說來還是內行的，是可以而且必須領導的。當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是從事一切科學部門的知識分子都必須不斷學習的，特別是對於只有專業的知識的人來說，更必須努力學習。對於技術的、業務的領

导,如果自己外行,那就要变外行为内行,就要努力学技术,学业务,但絕不应该害怕。怕水的人是永远不会学会游泳的。在抗日战争开始时,党提出“脱下長衫,发动游击战争”的任务,当时对于很多同志也是新的任务,是外行。但是只要在党的领导下,脱下了長衫,拿起了枪杆子,打了許多仗,有胜仗,也有败仗,这也就逐渐地变成了内行。在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初期,也有人还害怕当县长,当专员,那时也有些有右倾思想的同志,还想找“当官内行”的国民党来干。抱着敌对态度的人们也在嘲笑說:“泥腿子怎么能当县长?”結果还不是当了,积累了經驗,也就变成了内行。而国民党那一套内行的“做官秘訣”,却毫无用处。在大城市剛解放时,敌人也嘲笑过共产党是外行,一定管不好城市,不会领导全国政权,并且預言一定要向帝国主义者乞討的。但是,只要在党的领导下,投身到这些实际的革命斗争的崗位上去,也都逐步地变成了内行,并且还是出色的内行。复杂的艰巨的革命斗争任务,从来没有吓倒过共产党人,难道社会主义建設的任务就能把共产党人吓倒了嗎?当然,我們不应当輕視在我們这个六万万人口的大國中建設社会主义任务的艰巨性,我們过去熟悉的东西,有許多是用不上了,許多新的任务提出来了。但是今天我們已經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清除了障碍,打下了地基。今天是人民的天下,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权,我們可以有也应该有一切方便的条件,来培养我們工人阶级自己的宏大的知識分子的队伍。

人們都知道,世界上的資本主义国家,当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时候,文化科学的知識却是掌握在封建阶级的手里的,新兴的资产阶级曾經被認為是外行的,因而资产阶级总是花費

了許多金錢和時間來建立起自己本階級的知識分子隊伍。正因為有了這一條，他們曾經鞏固了資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列寧曾經強調地指出過我們工人階級應該記取這條經驗，建立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蘇聯建國的成功，也證明了這個經驗的重要。當然，工人階級是最大公無私的階級，其他階級的知識分子只要拋棄了自己的立場，真正站到無產階級方面來，他也就可以成為工人階級知識分子隊伍中的一員。

我們需要的內行，是工人階級的內行，是社會主義的內行，是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要做一個真正的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就要反對資產階級思想，反對自私自利的思想，反對個人主義、本位主義、絕對平均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民族主義等等錯誤思想，就要在實際工作中，在群眾性的政治和思想鬥爭中，在黨團的基層組織中，全心全意為工農兵服務，和工農兵相結合，不斷地鍛煉和改造自己。我們一定能夠看到中國工人階級將有自己的出色的科學家和技術人才，自己的出色的文學家、藝術家，自己的出色的編輯和記者，自己的出色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以及各種各式的真正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內行人，為建設社會主義而鬥爭。

（原載1957年8月26日“中國青年報”）

击退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專政的进攻

吳 江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和十一日，“光明日报”第一版上面，兩次刊載了陈新桂的攻击无产阶级專政并附和儲安平的所謂“党天下”說的言論。陈新桂認為，无产阶级專政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社会上一切矛盾的总根源。右派分子攻击无产阶级專政，不只是陈新桂一人，对于无产阶级專政和党的领导的攻击，是这次资产阶级右派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一个总題目；但是，陈新桂的言論却在右派分子中間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而且，他又儼然是以右派“理論家”的姿态出現的。既然如此，既然陈新桂的这些言論涉及到我們国家生活中的最根本的是非問題，那末，我們也就不怕被他罵为“卫道者”或“全面論者”（这是在他发言中預先为批判他論点的人所加的帽子，以封人之嘴），而要在这里来初步地爭論一下这个問題。

混水摸魚的手法

陈新桂說：无产阶级專政是历史范疇，不是自古有之，也不是万古長存，它是一定历史阶段中阶级斗争的产物。这个論点是没有什么可爭論的。但是，无产阶级專政的内容究竟是什么？陈新桂避而不談这个問題；他只是說：无产阶级專政“是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政治形式，这一政治形式可

以有多种多样。”

要在解釋无产階級專政的基本內容上做一个“全面論者”是相当困难的，然而不指明这个內容，我們就容易落入圈套。无产階級專政，用极簡短的話來說，这就是：工人階級（通过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治权力，对社会实行国家領導；任务是重新組織社会——保證消灭資本主义制度和小私有制度和完全消灭階級，建設社会主义社会，并保證过渡到无階級、无国家的社会；为达此目的所采取的方法，是对于反动階級和反动派实行專政，对于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并使这两者互相結合起来。

上述三个方面無論缺少那一个方面，都不成其为无产階級專政。无产階級專政就其形式來說，随各时代各国各民族的不同条件而异，人民民主形式不同于苏維埃形式，各人民民主国家也具有不同的形式，这是不可能划一的，但它們的基本內容應該是同一的。从这方面來說，无产階級專政不是政体問題或政权構成的形式問題，它首先是一个国体問題，即工人階級管理国家或工人階級居于国家的領導地位的問題。陈新桂把无产階級專政归結为“多种多样的政治形式”，这就輕輕地把一个国体問題偷換成为政体問題，从而使一切主要問題含混起来。

陈新桂不同于某些右派分子的地方，是在于他并不露骨地咒罵无产階級專政，不說“无产階級專政的国家就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之类的话，他表面上承認无产階級專政是一种必然的历史現象，他口头上也挂着馬克思主义，并且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說什么无产階級專政“可以有多种多样，可以根据历史經驗作必要的适当的改进”，无产階級專政的理論应当有所发展等等。他談論无产階級專政的阴暗面、缺点、困难，

但是最終把这一切归结到由于“共产党的执政”，由于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的地位摆得不适当。就是这样，他用“多种多样的政治形式”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发展”的谈论来把水搞混，以掩护他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最根本的东西——共产党的国家领导权。陈新桂在右派分子們中間被目为“有理论”的人，看来不是沒有道理的。

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

儲安平創“党天下”之說，“党天下”者，共产党“一党专政”也。陈新桂認為这是“完全合乎实际情况的，只是他沒有再进一步追究根源。”按照这位“理论家”的見解，这个根源就在于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上一切矛盾和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总根。

这种說法的荒謬透頂虽是人們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但目前并不是沒有少数附和者和追隨者。

大家知道，国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內，是阶级矛盾的产物，自从有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就有了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等等东西。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剝削阶级专政的国家，虽然同是阶级矛盾的产物，却有原則上的区别：剝削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少数剝削者压迫多数劳动者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制度在其本質上不能不是宗派、官僚制度。剝削阶级的国家統治，从表面上看来好象临駕于社会阶级矛盾之上，实际上它們的作用是不断加深社会矛盾。无产阶级专政則与此全然不同，无产阶级以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从而消灭自身和国家为己任，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等都是和无阶级的本質格格不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社会矛盾日益

加深的狀況下走上历史舞台,面对着客观存在的复杂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大体上分为两大类: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无产阶级專政的任务就在于用專政制度彻底解决前一类矛盾,又用民主制度逐步地解决后一类矛盾,最后使長期被阶级矛盾所分裂了的社会重新归于統一,真正成为自由平等生产者联合的社会。剝削阶级專政的国家一旦被无产阶级專政的国家所代替,官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也就被摧毁了,但它的遺毒还会長时期留傳下来。无产阶级專政保証消灭了私有制、阶级及其痕迹之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特权思想等旧社会遺毒才会最后被清除掉。这就是說,无产阶级專政本身不仅不是什么产生阶级矛盾和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恰巧相反,它的任务在于排除阶级矛盾和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

陈新桂替儲安平的“党天下”之說找根源,認為这个根源就是无产阶级專政,但他又断定无产阶级專政之所以成为“三害”的根源,也还在于“党天下”。姑且不說陈新桂这种兜圈子的概念游戏的荒誕可笑,就看看他的最后的推断吧:“党首先信任党员,党员信任团员和积极分子,这样,如果没有宗派主义以及由此滋長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是难以想象的”。

这真是难以想象的:右派分子竟至于利用共产党的整风,利用共产党誠心誠意地請党外朋友帮助自己整风的机会,而把反对的矛头指向共产党,指向共产党的领导权。目前右派分子大都宗奉这样一个公式:宗派主义是“三害”的主干,而共产党是宗派主义的根,共产党不除,“三害”不去。右派分子大概以为,只要抬出所謂“党天下”来,就能激起人們特别是民主党派的人們和资产阶级知識分子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滿,民

主党派的人們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會跟着他們去把共產黨哄下台來，甚至去“殺共產黨”。

不管右派分子對於這件事的可能性的估計如何，我們仍不能不指出：這是右派分子的一個惡毒的詭計，也是右派分子的反動性的主要表現之一。

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懂得：無產階級專政是通過共產黨來實現的，沒有共產黨這個領導力量，就根本談不上什麼無產階級專政。所謂通過共產黨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共產黨直接實現這個專政，而是無產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下通過國家機關實現專政。黨的領導權是無產階級專政中最主要的東西。共產黨對於國家政權的領導權是不能分割的，換句話說，共產黨不和其他階級或政黨分掌國家領導權，這是確定不移的，不可動搖的。宋慶齡先生說：“否認共產黨的領導，在客觀上、事實上就是要使歷史倒退過去，就是要使資本主義復辟，就是要使我們全國人民重陷於奴隸的地位。”民革的程潛老先生也說：“打麻將可以四人輪流做莊，政治領導斷然不能如此。”這些都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如果因此就說共產黨人“家天下”，不開放政權，共產黨人獨霸政權機關，不讓其他人參加政權機關，那就是純粹的撒謊了。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機關中，不論任何情況下，所實行的都是黨和非黨聯盟的制度，決不是只有無產階級或只有共產黨人才可以在政權機關中工作，而且，無產階級專政本身就是無產階級（通過共產黨）領導下的特殊形式的階級聯盟，這種聯盟的基礎在我們國是這樣的廣泛，以至於連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的許多代表人物也參加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關，有的並且身居要位。在這種情況下，還說什麼共產黨“家天下”，其用心就不能不引

起我們注意，也值得全国人民注意。

共产党员中有某些宗派主义的倾向，这是事实，克服宗派主义倾向，正是共产党整风的目的之一。但是，这难道可以说共产党是一个宗派小集团么？我們已经说过，宗派主义是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专政以及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政党本身必然具有并且大量培植的东西，这些集团对于人民的关系不必说了，就是它们的内部，也因利害冲突争权夺利而经常陷于四分五裂、宗派倾轧、你死我活的状态之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所担负的共产主义事业、解放全人类的事业，恰巧是为着最终消除这种现象。宗派者，私利也，共产党以全体人民的利益为依归，它除了人民的利益，本身决不图任何私利，因此，不仅共产党本身按其性质来说不能认为是宗派小集团，而且，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社会上由来已久的宗派主义现象才能逐步减少以至最后消失。

但是，共产党员是会犯宗派主义错误的，有时某些党组织的某些工作也会表现出某种宗派主义倾向，这是因为什么呢？这不仅有个人意识上的原因，也有工作赶不上客观形势发展的原因，例如当形势发展了，敌对阶级基本消灭，人民内部的关系改变了，需要进一步扩大民主了，但是某些党组织的某些工作或对于某些问题的处理却还采取老一套的办法和作风，不能及时转变，以致造成某些用心虽是为党为人民但实际结果却不利于与非党人士共事合作的宗派主义现象，或党与非党之间的某种不公平现象。共产党懂得，这种现象是不好的，要消除这种现象，不仅需要党内检查，尤其需要依靠非党朋友的揭露与批评。共产党的整风抱着这种愿望，许多非党人士也了解这种愿望，对于共产党和某些共产党员进行了诚恳的、

正确的或虽欠正确但却是善意的批評。

但是，这时有少数分子却表現得异乎寻常，他們批評共产党，却把党归結为宗派主义的根源，他們把事情說成好象是“共产党员在对非党人員实行專政”、“党占有着国家”；他們把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須坚持的階級立場和与資产階級思想划清界限的行动，也說成是宗派主义表現。他們甚至提出取消共产党的組織，將党的組織溶化于国家組織中。他們認為“一党專政”或“黨員專政”是无产階級專政的必然邏輯，并且声称要消除这种現象，只靠多少年一次整风是不行的，問題必須从根本上解决。如此等等。

这些暴露了目前右派分子的一种企图，他們想利用“一党專政”、“黨員專政”、“党天下”等这些捏造出来的东西去吓唬和煽动一些人。他們想吓唬誰呢？共产党是吓唬不了的，共产党不会因为有人拿“一党專政”一吓唬就把自己的領導地位讓出来，說：右派老爷們，你們請吧！人民也决不答应共产党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了，就等于社会主义的灭亡，資本主义的复辟。那末右派分子在这里究竟是想煽动一些什么人呢？他們是想煽动、利用一些怀着資本主义情緒的資产階級分子和資产階級知識分子，企图挑撥党和非党的关系，以便孤立共产党，最后推翻共产党的領導。

共产党的領導是无产階級專政的灵魂。我国宪法第一条就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工人階級的領導必須通过共产党，沒有共产党的領導，工人階級領導也就成了一句空話。右派分子正是在这个极其重要的問題上大做文章，他們說：共产党的領導是宗派主义的根源，是“溝”和“牆”的根源，因此，共产党

不应当領導國家，如果領導了那就是“黨天下”。不要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不要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政權”！你們看：天下老鴉不是一般黑嗎？中外資產階級的階級本能是一樣的，他們都本能地懂得要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必先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因此，要不要無產階級專政，從而要不要共產黨的領導，是我們和資產階級右派的根本分歧所在。

右派分子是趁這次黨的整風來向共產黨發起攻擊的，這又使他們多一件外衣，來迷惑和煽動那些懷着資本主義情緒的人們，把攻擊的矛頭指向無產階級專政的要害——黨的領導問題。

右派分子聲稱多少年一次整風不行，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他們有什麼根本解決問題的办法沒有呢？答曰有的，那就是組織聯合政府、民主黨派輪流執政等等。這就是所謂“政治設計”。預想中的“政治設計院”未開張，“成品”倒先拿出來了。

“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和聯合政府

陳新桂在他的第二次發言中曾說：民主黨派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用來聯繫群眾的杠桿、傳導帶，實際上是工具，完全被動，不可能發生主觀能動性。他以為無產階級專政應根據歷史經驗作必要的改進；他認為，自從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以後，民主黨派就不再是傳導帶了，就有主觀能動性了，這是毛主席發展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但是，他又說：提出這办法的時間還短，還需要更進一步推動。

稍有政治嗅覺的人都能察覺出來：這裡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應作必要的改進”呀，“民主黨派不是傳導帶”呀，要“有主觀能動性”呀，“需要更進一步推動”呀，等等，都是直接和儲安

平提出的以“联合政府”代替“党天下”的方案有关的。在另一次发言中陈新桂又说：共产党一党專政，叫民主党派如何监督？这就是明明白白的說：共产党不能独掌国家领导权，讓我們大家来；民主党派也应是国家的领导力量，不能只做傳导帶。

这样，政治改制的理論和方案都設計出来了，这也算得上是一个集体創作。

无产階級專政和民主党派的关系究竟如何呢？这是一个必須回答的問題。

多党多派不是无产階級專政的必备标志，也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邏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質是劳动者掌握政权）。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例如在我国条件下，多党多派不仅是和无产階級專政的原則相容的，而且也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特殊表現之一。这种現象，有力地駁倒了世界上反动派的造謠，反动派硬說无产階級政党在为民主而斗争中和其他民主党派合作，是不得已的、暫时的，將來共产党执政就会將民主党派一脚踢开，因为多党多派和无产階級專政不相容，多党多派只有在資产階級議會制下才能存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實踐，使資产階級反动派以多党制的宣傳掩盖自己血腥專政的作法破产了。

无产階級專政作为領導者无产階級和被領導者非无产階級群众的一种特殊階級联盟，这种联盟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以多党共存的形式表現出来。但无产階級專政下的多党共存和資产階級專政下的多党共存，是原則上不同的兩種現象。无产階級專政下的多党共存，是在共产党政治領導下的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共存。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彼

此合作,而又互相監督,这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它們之間的关系完全不同于也不应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政党之間的那种关系:在朝在野,彼此謾罵,互相抑制、拆台,等等。

“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这个口号,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历史条件提出来的。这是共产党的愿望和方針。正如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所說:“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長期存在下去,不是單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現,要看它們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之間的互相監督,互相提意見和批評,也只能是在有利于团結,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巩固无产階級專政和共产党的領導等等条件下,才能真正發揮互相監督的积极作用。离开了这些条件和方向,就达不到“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陈新桂等右派分子为民主党派的設計,却正是完全脫离了上述的条件和方向。他們要民主党派爭取的“主动”,是不做无产階級專政的工具、傳導帶,而做无产階級專政的領導力量、发动机。他們所說的“互相監督”是輪流执政,兩院制,联合政府,等等。如果實現了这一切,在右派分子們看来,民主党派就可以充分地發揮主觀能动性,无产階級專政也可以获得“适当的必要的改进”了。

大家請看:这不是在把民主党派引上一条錯誤的道路么?右派分子为无产階級專政所設計的“改进”是怎样一种“改进”?这离民主党派所应有的“主动性”和我們所实行的“互相監督”有多么远!头腦健全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右派分子是在这里代表資产階級立場向无产階級專政进攻,同时对于民主党派是在实行倒帮忙。

这里值得注意的一个問題是:我国各民主党派的現狀如

何？这次资产阶级右派的活动是以民主党派为基地的。虽然各民主党派内部右派活动的严重程度不同，但是，在一个时间内，右派路线在各民主党派内都有深刻影响，有的并且曾经占了上风。各民主党派有许多组织在一个时间内成了右派分子用来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合法工具。我们知道，我国各民主党派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的政党，这些民主党派又都是在民主革命阶段成立起来的。就现状说，各民主党派在总的方面还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还没有成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因此，就各民主党派本身来说，正亟待作一个根本的改进，这个改进就是要使这些还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改变成为社会主义政党，真正能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一个本质的改造。不经过这个本质的改造，各民主党派就不能同共产党一起“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右派分子要把我国各民主党派引上一条自外于人民、自绝于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则要把我国各民主党派引上一条真正能够同共产党一道实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道路，——这又是我们和右派分子的分歧之一。

究竟是听共产党的话，还是听右派分子的话？这一点须由各民主党派自行选择。

右派分子在现在这个时候来提出联合政府，自以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可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你们答应的事情为什么不实行？右派分子以为中国人民都愚蠢得可以任凭他们随意摆布，以为中国人民都分辨不清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过去所提出的联合政府乃是为完成民主革命所采用的一种国家制度（这里我们要说明一句：即使是这个联合政府，也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现在这个时代早已过去了，两次革命都已经取得

了偉大的勝利，歷史的車輪不能再倒轉到十年以前去；此外，右派分子也以為中國人民認識不清目前在我國存在着這樣一個突出的事實：這就是我國人民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偉大鬥爭中已經結成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的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綫，這個統一戰綫的基礎在現時不是比過去縮小，而是甚至比過去更加擴大了。右派分子目前打起聯合政府的招牌，是企圖在人民面前公然歪曲這樣的历史事實。他們聲嘶力竭地喊叫“現在的政府不象個聯合政府”呀，“需要對統一戰綫工作做一個總結”呀之類，其用心無非是想排除共產黨在我們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面的領導地位，包括統一戰綫中的領導地位。“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右派‘鳴放’，意在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推翻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人民日報”社論的這幾句話是說得很不錯的。右派分子之召喚聯合政府，其用心並不在於人民群众的“聯合”，而在於資產階級的“專政”，在於過去半殖民地制度的恢復。怪不得“聯合政府”的旗幟一展，台灣和香港的反動報刊立即報之以掌聲，認為這是“鐵肩担道義”，“實在是一個不可忽視的起點”。以“理論分析”見稱的陳新桂先生，你是否發現在這裏也有一點“必然的邏輯”呢？

無產階級專政的發展

有人說：右派分子常常是野心家。這話証諸以上所說是一針見血的。當然，對於野心家的用心也可有不同的解釋，可以象老舍先生那樣的解釋：這些人修正別人，也最會修正自己，只要有機可乘，叫他們加入保皇黨，他們也會跪接聖旨；也可以象鄧初民先生那樣的解釋：他們創“黨天下”之說，不過是

企图乘机来一次政治訛詐，意在將來政府改組中的副主席和副总理的职位。从我們的題目来解釋，則这些野心家之意最終是在无产階級專政的“根本变革”。

不是么？儲安平的“党天下”之說一出来，資产階級右派的头目之一章伯鈞就說这“打中了要害”，接着陈新桂又赶忙从“理論”上来論証，追究出“三害”的根源在于无产階級專政，并且坚持地这样說。他們之所以这样，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認識到无产階級專政是“要害”，另一方面也認為目前时机已到。

目前，我国的无产階級專政無論在理論上或實踐上都确有发展。国内敌我矛盾基本解决，退居到次要地位，人民内部的矛盾突出，大規模的暴风雨式的群众階級斗争基本上过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无产階級專政的兩個制度——民主制度和專政制度需要进一步加以調整，改善其工作的各个环节，民主制度將大大地扩大其作用范围，以便有效地解决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这是一件很复杂的、特別需要細致进行的工作。

“百花齐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的提出和實踐，以及人民内部矛盾的探究，將“团結——批評——团結”的公式的应用普及到人民内部的各个角落，这些都是我国无产階級專政发展和日益完善的重要标志。“百花齐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团結——批評——团結”等，不仅不同无产階級專政的概念相抵触，不同无产階級和共产党在各个方面的領導权相抵触，恰巧相反，它們是为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加强无产階級專政和党的領導所需要的。至于如何应用这些方針来达到这目的，自然需要在實踐中探索，目前党的整风运动也可以說是一种探索。

少数右派分子看錯了局勢，“匈牙利事件”使他們心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的提出，使他們認為實行他們那一套的條件具備了，此後“可有作為”了，黨的整風運動則使他們認為時機已到，於是什麼“黨天下”呀，“無產階級專政是禍根”呀等大叫一通，企圖按照他們所設計的政治方案（“聯合政府”，“政治設計院”，“搞個上議院”等，合稱“中西合璧的政治”），來“推動”無產階級專政的“改進”。右派分子的這種企圖當然是我們必須反對的，但右派分子所說的這一切，却也很可以使我們想一想：在敵我矛盾退居到次要地位、人民內部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的情況下，鬥爭是怎樣進行的？階級分析的武器是否可以拋棄？右派分子為什麼要拿無產階級專政和黨的領導權做為他們攻擊的目標？我們應當怎樣進行工作？

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的政治合作，以至於“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個特點，也是它的一個重要環節。這是中國共產黨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踐和理論的一個貢獻；中國的民主黨派如果在今後能夠繼續取得人民的信任，它們也將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上占一個有光采的地位。右派分子特別在民主黨派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關係問題上大做其文章，歪曲這種關係，用一些惡劣的“政治設計”企圖拖垮民主黨派，其用心固然是叵測的，但是事情如我們所指出的，這次鬥爭也暴露了各民主黨派的現狀和社會主義需要之間的一個嚴重矛盾：社會主義在我國已經長足進展，各民主黨派在總的方面卻依然停在資產階級性質上。這個矛盾必然招來右派分子的興風作浪。解決這個矛盾，即從根本性質上改造各民主黨派，無疑也成了目前進一步發展無產階級專政的

內容之一。目前各民主黨派的整風，正是實行這種改造的開始。民主黨派整風告訴我們：右派分子的努力是心勞日拙的，他們肯定是要失敗的。

(原載“學習”1957年13期)

社会主义制度和等級制度

叶 夔 生

懂得馬克思主义常識的人都知道等級制度是階級社会的产物。共产党所追求的最終目的——共产主义社会，正是消灭了階級从而消灭了人类社会一切不平等現象的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們都能够“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我国在去年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基本上取得胜利之后，私有制为公有制所替代，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許許多多不平等現象，正在逐步改变和消失中。全国人民都为这一偉大胜利而欢欣鼓舞，欢呼我国社会向彻底平等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大大地跨进了一步。

可是，違背全体人民利益的右派分子却在宏大的欢呼声浪里发出了刺耳的嚎叫，說什么人民生活各方面都打上了等級烙印，替“被压在等級底层的群众”抱不平，說他們在經濟、政治、文化娱乐各种生活上都得不到平等的待遇，煽动他們起来打倒共产党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以寻求“平等”。

事情真是这样嗎？如果右派分子的狂妄企图真能得逞，那时候，他們所要挽救的“被压在等級底层的”人們的地位，决不会上升，將要从現在比較平等的地位上落进最不平等的深淵，而右派分子將站在他們头上来放手压迫和剝削他們了。

誰要怀疑这一可能，就請看一下今天的事实吧。

右派分子已經煽动和准备煽动起来鬧事的是哪些所謂等

級底层的群众呢？已經受到煽动的有机关企业中的公教人員，准备进行煽动而未能得手的有工人和农民。这些人在革命前过的是怎样的“平等”生活，在革命胜利后又过着怎样的“不平等”生活呢？处罰与开除，夺佃和加租，毕业即失业，所用非所学等等叫做“平等”生活；工人管理工厂，农民作了土地主人，工程技术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智力和創造天才等等叫做“不平等”生活；这是根据什么邏輯得出的結論呢？事实具在，讓人們去对比和研究吧。

我們社会上确实还有不完全平等的現象，右派分子正是抓住这一現象加以扩大歪曲，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惡毒的攻击。我們應該在揭露了右派分子造謠之后，更进一步追問这种不平等現象到底从何产生？它的社会根源何在？因为这一現象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要說明問題，也必須从社会历史发展中寻求答案。

在沒有階級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人們是平等的。尽管人們天賦的智力体力各有强弱，互不相同，但他們在自己的氏族中都做着自己能够担負的一分工作，也从集体劳动产品中分享自己应得的一分。等級这个字眼，在那时候人們的头脑中是不存在的。等級制度是随着階級的发生发展而发生发展的。剝削階級必須强占并不断扩大某些特权来保持其剝削的权利，而被剝削階級也因为不断失去某些权利而无法摆脱剝削。享有不同特权的人們和失去不同特权的人們之間自然形成各种等級。到了封建社会制度发展到最完备的时期，也就是依靠严格的等級制度来維持社会秩序的。在这种社会里，維持等級制度是重要的社会道德，誰要敢于破坏这种制度就絕不为社会道德所容許。宣傳忠孝节义等等为最高道德标

准，不外是教导人們應該好好地服从等級制度的社会秩序。

从封建社会中胎育出来的摧毁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为着追求高额利润的自由，首先要求冲破封建制度的束缚，向封建主提出反对等級制度。“天赋人权”，“不自由毋宁死”在当时是多么响亮的激动人心的号召呵！

在長期搏斗中资产阶级终于胜利了。但是，是不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真正消除了不平等而得到了平等呢？不是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由平等不过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虚伪的东西。劳动人民为了争取自由平等流过大量鲜血，得到的不过是法权上的平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至于经济上的不平等，却远比封建社会中的差别更为尖锐，在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市場上，受到失业威胁的劳动者并没有决定劳动力价格的自由。有充分自由的只是占有生产资料因而有权自由选購劳动力的资本家。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社会中人身隶属的等級制度，使人們在法律地位上得到平等（其实这是一句空話）；资产阶级的法律在全力保护资本家特权上却更加扩大了人們在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

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地主资本家的特权，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給了人們在各方面获得绝对自由平等的最大可能。

按照馬克思主义原理，共产主义社会的建成需要經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共产主义低级阶段（普通称为社会主义阶段），这个阶段就是无产阶级專政的过渡时期。只有經過过渡时期中社会主义建設的高度发展之后，才能走上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馬克思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理論去考察現代资本主义。馬克思也用这个理論去考察资本主义行將崩潰的問題，并运用这个理論去考察將

来共产主义底将要发展的問題，在“哥达綱領批判”一書中描繪出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概况。馬克思認為在过渡时期，虽然在所有制方面已經达到了取消資本主义私有制，代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在分配方面还不能不保存資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換的痕迹：“按等量劳动領得等量产品”。这种分配办法，表面上是公平的，实际上还没有达到真正公平。例如两个人以相等的劳动領得相等产品，可是一个人沒有小孩，一个人却要負担撫养几个孩子的費用，因而这两个人的享受就絕不是平等的了。

劳动者获得“按劳取酬”权利平等的原則，比之資本主义社会中剝削者不劳而获是一极大的进步。但是这个原則还没有完全摆脱資产階級法权的一些缺点。馬克思指出：“但是这些缺点，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中，在它經過長久的孕育痛苦以后剛剛从資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說这是不可避免的缺点呢？因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可能有别的分配办法来代替“按劳取酬”原則。小資产階級所說的公平分配不过是一种幻想，如果不按一定劳动量来支取一定劳动产品，就不可能鼓舞人們劳动热忱，使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只有在人們从道德、智慧的方面都提高到高級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准；而且在經济发展上也达到产品万分充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限度后，人們才有資格以“各取所需”的原則来代替“按劳取酬”的原則。所以馬克思又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級阶段上；当那奴役人們、迫使其服从社会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后；当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隨之消失后；当劳动已經不單單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已成为乐生的第一要素时；当生产力已隨着每个人在各方面发

展而增高，一切公共財富源泉都盡量涌現出來時，——只有這時，才可能把資產階級式的法權的狹隘眼界完全克服，而社會就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用這一馬克思主義原理來檢查我國今天的實際生活，到底有哪些等級制度呢？有封建主特權制度么？地主階級早在土地改革中被消滅了。有資產階級經濟特權制度嗎？也已經在社會主義改造中基本上被改造了。還有什麼不平等呢？只有由於“按勞取酬”這一制度還不夠完善而體現了一些不平等的痕迹。這些痕迹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在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中國家實施了“統籌兼顧、統一安排”的政策。在安排中有些人士由於歷史原因所領取的工資比能力相等的人多了一些；也有的人得到的待遇和他的行為能力極不相稱，例如復旦大學“教授”右派分子孫大雨長年請假，不去教育青年，却專門造謠生事，攻擊民主人士，破壞社會主義；但他却按月領取國家的工資和生活津貼四百多元，這自然是不公平的事情。另一方面是全國革命勝利之後，國家工作人員從長期革命戰爭中的供給制轉為工資制，有些供給制的殘余還沒有完全消除，因此也顯得有些不合理。但是，上述這些不尽合理，不夠平等的現象在我國社會生活中不過是個別現象，並非生活主流。在國家依照“按勞取酬”原則制定的工資制度中，工資級別之間懸殊不大，最高工資和最低工資之間的距離比舊中國時代是大大縮短了。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政府高級官吏的名義工資（實際上的非法貪污所得且不去計算，因為無法計算）不但比普通工人所得高許多倍，就是比著名學者、文藝工作者的收入也高得多。在今天，貪污是基本上消除了，政府高級負責人所領的工資比普通工人的工資高

得不多，而比著名文艺工作者的收入要低得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工资不过五百多元，而一些著名文艺工作者每月收入都在千元以上）。就是这样，国家在去年工资改革时，还是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十级以上的工资减降一些，尽量把工资总额中增加部分分配给低薪工作人员。今后，工资总额将随着国民经济发展而不断增加，而这增加部分又将尽可能分配到低薪人员那一方面去，这样，工资等级间的距离就更能缩短了。

但是，无论如何缩短工资等级之间的差别，在“各取所需”的原则还不能代替“按劳取酬”原则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分配上不平等还是不能避免的。要消灭这一不平等别无其他道路，只有努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以期能顺利地进入实行“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

右派分子大喊大叫反对等级制度，其真正目的何在呢？不过是仇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的“按劳取酬”这一原则，妄图取消这一原则而已。在今天，取消“按劳取酬”原则，又拿什么原则来代替呢？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一更高的原则吗？这是今天所做不到的也是右派分子所绝对不同意的。他们所希望的不过是用资产阶级式的自由剥削制度来代替“按劳取酬”这一社会主义制度而已！拨开云雾见青天，大喊大叫反对等级制度的右派分子，不过是要在平等的烟幕掩盖下对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施行凶恶的进攻吧了。

但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是爱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他们也更向往于实现完全平等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为了美好的将来，我们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正是要用全力来巩固我们的可爱的社会主义制度！

（原载1957年7月15日“中国青年报”）

駁所謂“等級制度”

叶蠖生

在前一篇文章里，我已从社会主义經濟基础不允許它的上层建筑形成等級制度这一方面談了一些原則性問題，現在打算再从一些具体問題上来駁斥散播較广的一些右派謬論。

右派分子散播的等級制度的謬論虽有各色各样，但归納起来不外兩大类。第一类是从經濟生活方面来进攻的謬論，誣蔑我国工資制度为不合理，說什么自从工資改革以后，处处按級別办事，在生活各方面打上了級別的烙印。第二类是从政治生活方面来进攻的謬論，誣蔑我国政治生活不民主，共产党享有种种特权，其他民主党派是不起实际作用的花瓶，共产党形成了独占統治权力的特权階級。

右派分子制造这些謬論是抱有很大野心的，他們企图从經濟生活入手，以挑起不滿，煽动人心，破坏領導者和被領導者之間的正常关系，然后进而展开政治攻势，从反对共产党的領導来达到推翻我国根本大法——宪法中所明确規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工人階級領導的这一基本原則。誰都知道，工人階級的領導只能通过本階級政党——共产党来实现。右派分子如果真能推翻共产党的領導，也就在實質上推翻我国由工人階級領導的社会主义制度了。

只要我們从实际生活中認真地来看一看，就不难发现右派分子的一切謬論都是毫无根据，完全站不住脚的。現在，我

們就从实际生活出发来揭开第一类謬論的虛伪面幕吧。

右派分子所竭力攻击的工資改革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必須簡單地回顧一下这次改革的历史根源。在全国革命胜利以前，解放区中实行的是供給制，从事革命工作的人，除了由公家供給衣食和极微少的零用津貼以外，沒有多余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談不到按劳取酬，也談不到贍养家庭。

革命在全国範圍內胜利之后，情形起了很大的变化。以下这些情况出現了：許多革命工作者和分隔多年的家庭重新取得了联系，生活困难的直系亲屬要求他們負担起撫养的义务；为了革命而多年过着独身生活的人，也多半結了婚，生了子女，因此，需要担負起撫养的义务。国家如果把这些應該撫养的人口都实行供給，不但財政上会产生困难，而且也会产生很大浪費。要合理解决这些问题，只有把革命战争时期的供給制改变为和平时期的薪給制。

但是，一下子全部实行薪給制，会給国家財政上增加很大压力。为了便利于国民經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設，国家号召革命工作者忍受暫时的困难，繼續接受一个时期的战时供給制的待遇。这一号召得到了热烈的响应，許多革命工作者在革命胜利多年之后，仍然过着比較艰苦的供給制的生活。

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方面是这样：全国胜利后，国家对新解放区中的旧公教人員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在三大改造中，国家对合营企业中的私方人員也采取了合理安排的政策。属于这两类的职工，大部分是按原来工資数额支薪的。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腐敗，旧中国的工資制度是既杂乱而又不合理的。不但不同地区、不同机关和不同

企業間的工資有很多不合理的現象，就是在同一個機關、企業中，職工的工資也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國家如果長久對這些不合理的現象不加以調整，就不可能充分發揮這些職工的勞動熱忱和創造性。由於五年計劃的逐年勝利完成，國家有可能增加工資總額，用以調整各種不合理的工資差額和徹底取消供給制，並使勞動者的工資得到較大的增加。經過這樣調整之後，全國工資制度比較劃一了，升級辦法也比較明確了，一般的職工的收入也都有了提高。因而只要不是別有用心的人，就不能不承認1956年的工資改革是獲得重大成就的。

可是，右派分子偏偏攻擊這一重大成就，說它給人們生活打上了級別的烙印。這樣說有什麼根據？怎麼能說工資分出等級就是打上了級別烙印？試問工資不分等級又以什麼辦法來體現按勞取酬的原則呢？

右派分子也知道把工資分級硬說成是等級制是站不住腳的，於是他們故意把國家工作人員因工作崗位不同而工作條件有所不同，因而享受不同待遇（如分配辦公室，供給辦公用具，使用交通工具等）這一事實，與工資級別硬拉在一起，用以證明工資改革改錯了，結果是改出了一個封建等級制度來了。

當然這不是事實，而是完全違反事實的虛構。詳細檢查國務院關於工資改革的各種文件，就可以看到國務院除去規定各級工資差額之外，就絕沒有對工作崗位不同應享受不同待遇作出規定。在國家草創伊始，物質條件還很困難時，應該因陋就簡，因地制宜地滿足工作需要，如果在這方面強作任何規定，反會難以執行。假如要制定條例，國家機關中部長待遇自然應該優於司局長，而司局長的待遇也應該優於處長。但實際生活證明並非如此。例如，一般說司局長一人可能配

給一間辦公室，正副部長可能配給專用汽車，但正有一些機關因為條件困難，正副部長沒有專用汽車，幾個司局長合用一間辦公室，也是常有的現象。

進一步說，將來物質條件具備時，國家如在這方面明確規定，不同崗位的幹部因工作需要必須給以不同待遇，這是否就能構成等級制度呢？當然不能。等級制度是一定社會的產物。在封建社會中貴族等級的形成是由於他們“高貴”的血統，他們的身分和平民截然隔絕，不能混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掌握了百萬資財的富翁儘管沒有貴族的稱號，依然是和普通勞動者截然隔絕，不容混淆的。

至於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國家領導人絕不能高踞在人民之上，而是人民的勤務員，他們既沒有什麼“高貴”的血統，也沒有私人掌握企業和莊園；他們只是由於在革命鬥爭中得到人民群眾的信任，才被推選到領導崗位上去的。他們除去因工作需要，不能不接受國家給予的一定待遇外，在私人生活上他們和普通人民是完全平等的。

右派分子們都非常推崇英美的民主生活，他們十分欣賞艾森豪威爾總統生活的“平民化”。那麼我們就拿這位“平民化”的美國總統的生活來看一看吧。根據美國報紙的記載，這位總統除去每年支取十萬美元薪金和五萬美元零用津貼之外，國家還供給他專用的別墅，專用的遊艇和專用的火車，至於專用飛機和汽車則不是一架和一輛，而是一隊隊的。為了管理總統的別墅和保養及駕駛總統這些專用的交通工具，國家每年支出的費用以百萬美元計。總統除去享用國家這些豪華的供應之外，還利用職權從全國各地收受大批禮物，總統田莊上的龐大牛群完全是各處送來的禮物，而每一頭乳牛的價

格却高达数千美元。这就是极端“平民化”的美国总统生活的写真。

反过来看一看被右派分子诬指为存在等级制度的我们的国家，情形又是怎样呢？我国的国家领导人从主席、副主席，委员长、副委员长到总理和副总理，他们除去支取一级至三级的工资之外，并没有享受额外供应，更没有什么专用别墅，专用交通工具。我们的毛主席确实收到过各国劳动人民和爱好和平的人士所赠送的许多珍贵礼物，可是他并没有私人庄园、别墅来贮藏这些礼物，而是把它们交给国家公开展览，供人民群众欣赏的。右派首领以前多半曾留学欧美，现在又在政府及民主党派中有很高职位，对于以上所说的这些情况原 is 知道得很清楚的，他们故意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其别有用心，还不是昭然若揭吗？

也许右派分子还不服气，说他们指摘的级别烙印不是针对国家领导人，而是一般领导干部。那么，我们再从一般领导干部方面来看吧。按照工资标准，一级总工程师的工资额比司局长的最高工资额高16%，比他们的最低的工资额则几乎高出一倍；大学一级教授的工资额比大学校长的最高工资额相差无几，比他们的最低工资额则高出一倍以上。但是，尽管在工资上有这样的差别，为了工作需要，工业管理局长和大学校长的工作条件，就没有理由比领取工资高的工程师和教授按照工资比例降低。反之，局长和校长由于工作需要而必须得到的供应，却不一定是工程师和教授所必需的。不是按照工资级别给所有的人打上级别的烙印，而是按照实际需要办事，难道这些具体事实还不足以证明吗？

右派分子的进攻，并没有停留在这儿，他们还有从政治生

活上进攻的一套。我們再进一步从这方面来揭露其有意誣蔑的手法吧。

我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經常教导全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心甘情愿地当好人民的勤务員。这一正确的教导是否在實踐中實現了呢？只要不存偏見，肯实事求是地考察一下事实，总会承認共产党在長期革命斗争中基本上實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一偉大原則的。无数党的先烈用自己的鮮血証实了这一点，使之成为无法加以否認的鉄的事实。右派分子，却妄想用虛伪手法来推翻这个事实。他們了解統一战綫是党的基本政策，联系群众是党的主要作风，于是他們就企图以虛構的謬論，从这两方面下手来进行破坏。

为了破坏党的統一战綫，右派分子就大叫民主党派参加政府工作是有职无权，在統一战綫中不起作用。

这是事实嗎？当然不是。

什么叫有权？什么叫作用？如果象章伯鈞、章乃器那样利用职权拿公家錢买古董，利用职权使自己經營的企业不納稅，利用地位在大鳴大放中四出招兵买馬，到处点火鬧事等等，这就可以肯定地說他們沒有这样的权，他們不能起这样的作用。

如果“有权”“起作用”指的是有权参与国家大政，在决策时起其应起的作用，那末，各民主党派的領導人是有这样的权，也起了这样的作用的。

誰都知道我国决定国家重大政治問題，都是先由党中央和各民主党派領導人在政协全委中进行反复協商，取得一致意見之后，再提到人大會議中去进行討論决定的。各民主党派領導人多数是政协委員同时又是人大代表，因而他們每次都有机会参与国家大政方針的决定。实际上，党中央常常把

許多重大問題先和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商討，待取得初步同意之後才去通知各部門和各地方黨的領導干部的。右派分子之所以拿“無權”、“不起作用”來向黨進攻，無非是企圖取共產黨而代之，要復辟資本主義制度罷了。

為了破壞黨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聯繫，右派分子就指摘共產黨員享受各種特權，誣蔑黨在執政後形成了統治人民的特權階級。

這是事實嗎？當然不是。只要指出他們叫得最凶的派遣留學生一事的真相，就不難證明右派分子攻擊共產黨員享受特權只是惡意的誣蔑了。

整風以來，右派分子在派遣留學生問題上大做文章，說什麼出國留學生不憑試卷，只憑資格，留學名額都被干部子弟和工農子弟占去了。事實是怎樣呢？據高等教育部的統計，全部留蘇學生中，干部子弟僅占3%，工農子弟也只占10%強；而地主富農子弟却占到30%，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子弟則占了57%的大多數。原來黨和工人階級所強占的特權就是如此呀！

至於攻擊共產黨在革命勝利後形成特權階級，這並不是我國右派分子的獨創，而是國際反共分子的通用手法。在國際反共活動中，從黨的叛徒，直到英美的一些反共策士所以都喜歡繼承托洛茨基分子所使用的手法，把共產黨形容成特權階級，這只是由於把黨的領導故意和階級專政混在一起，便於迷惑視聽罷了。要徹底揭破這一謬論，下面就從理論上、組織路線上和革命實踐上分別加以駁斥。

第一，按照馬克思主義原理，絕不能把黨的領導和階級專政混為一談。黨的領導主要依靠說服，而階級專政則主要使

用强制。党如果对人民群众不采用說服而采用强力压服,就会脱离群众而趋于灭亡。反之,阶级專政如果想仅仅依靠說服而放棄强制,也就难免不遇到被推翻阶级复辟的危險。党的领导是属于人民内部的事情,而阶级專政则为对付敌人的手段,两者范畴各异,絕不能相混。斯大林在他的著作中曾就这一問題作了正确的闡述。毛泽东同志在討論我国人民民主專政的重要文件中也对这一問題作了反复的說明。右派分子不是不知道这些經典著作的,只因其别有用心,所以要无视这一基本原理罢了。

第二,按照中国共产党的組織路綫,只有不从事剝削而又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人才能入党。这說明党絕不容許剝削分子混入党内。不但国家干部不能从事剝削,就是不脱离生产的工人农民的党员也是如此;每一个由于生产发展而发生了剝削行为的农民或手工工人,如果他们不改正錯誤,不放棄剝削,他们就必然被清除出党。由一群反对任何剝削、終身不懈为实现沒有剝削、沒有阶级的社会而奋斗的人組成的集体——共产党,在右派分子的眼里,反而变成了剝削人民,压迫人民的特权集团,这真是无法想象的怪事!

第三,具体从我們党的革命实践来看,事情就更加明显了。我們党在長期革命斗争中所以遇到許多波折,有过胜利也有过失敗,其主观上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党是否正确地执行了群众路綫。党在自己活动中只要少許違背群众路綫,工作就要遭受挫折,党如果一度离开群众路綫,革命就一定要受到暫时的失敗。自从遵义會議以后,群众路綫形成了党的重要政治路綫,从而使得中国革命斗争不再遭受重大挫折而一步步走向胜利。中国革命取得偉大胜利,就是我們党忠实于自

已政治路綫的明証。

我們黨一貫忠實于群眾路綫，它決定的一切重大政策必須來自群眾，為了群眾；它推行一切重大政策，也是依靠說服，使群眾自覺自願地去執行。對這樣一個黨，還能硬把它說成是特權階級么？

總之，在我國已經基本上消滅私有制建立了社會主義所有制的今天，已沒有產生等級制度和特權階級的基础，因而也就決不會在上層建築中產生什麼等級制度和特權階級。至於說在各種制度和工作中還存在缺點，那不但在立國不久的今天是難免的，即使在社會主義建成之後也還是難免的。我們要發現缺點，並且對這些缺點深惡痛絕，目的是要改正這些缺點。右派分子和我們截然不同，他們搜羅缺點，誇大缺點，甚至製造缺點，目的不是要改正缺點，而是要煽動人心，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使舊制度復辟。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擦亮眼睛，絕不要受其欺騙。

在揭破了右派分子的欺人謬論之後，我們不能不進一步問這些謬論有沒有市場？應該說在小資產階級中，特別是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這些謬論還是有一定的市場的。這是為什麼呢？難道因為這些人都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嗎？當然不是。他們之中，大多數人還是擁護黨和社會主義的。他們所以易于為右派分子的謊言謬論所迷惑，是因為他們主觀上有毛病，在他們的思想深處，還存在絕對平均主義的錯誤想法。

絕對平均主義是手工業和小農經濟的產物。小農經濟的生產工具和技术條件是很落后的，從事小農經濟生產的人看不到能夠從發展生產中來解決貧困問題；他們既反對地主殘

酷剝削，就要求把仅有的生活資料从剝削者手中夺取过来大家絕對平均享受。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絕對平均主义不但是无法實現的空想，而且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思想。

絕對平均主义所以是不能實現的空想，是因为每一个具体的人需要不同，如果把数量不多的生活資料絕對平均分配，必然会使得一些人感到过多，一些人感到不足；而且在广大人口中进行絕對平均分配，技术上也是非常难于办到的。

絕對平均主义思想所以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思想，是因为在人們道德水平和技术水平还没有达到符合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准时就去否定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則，一定会使人們的劳动热情和創造性受到阻碍，因而使生产力不能充分向前发展。

在革命队伍中傳播这种反动思想，只能起消极破坏作用。右派分子正是利用一些人們思想中还存在的絕對平均主义影响来进行破坏活动的。請設想一下，如果把按劳取酬說成是等級制，把領導干部的必需工作条件說成是階級特权而加以取消，那將怎么办事呢？势必任何人都領取相等的工資，接受相同的工作条件。这样真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設嗎？假如高級技术工人与徒工領取相同的工資，这对生产会起怎样的影响呢？只能起阻碍的作用。又假如取消国家領導人的一切政治保卫和工作便利条件，这又会产生怎样的結果呢？結果只能为政治暗害者大开方便之門，为决定国家政策帶來不可克服的困难。誰都知道，不允許一个將軍拿起电话机来指揮作战而要求他和士兵一同去扛机枪；不允許一位大学教授在房里安靜地备課，而要求他整天和服务員一同作清洁工作；都是十分可笑的。右派分子反对“特权”，反对“等級”的做法，正和上述

情况同样的可笑。不能觉察右派分子言行之荒唐可笑，那只是因为自己的头脑中有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残余在作怪罢了。

也许有人说：既然大家还不能绝对平等，为什么党中央号召革命者要和人民同甘共苦呢？不能绝对平等，就无法同甘共苦了。

谁都知道，革命者并不是苦行僧，他们所以忍受万分艰苦，并不是为了吃苦而吃苦，而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一伟大目标。如果把同甘共苦理解为绝对平均主义，这对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不利，因而也不是革命者所能接受的东西。

党所号召的同甘共苦，指的是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按劳取酬的工资差别不要悬殊太大，享受的工作便利条件不要超过最低需要，而绝对不是说要和人民同甘共苦而破坏按劳取酬原则和工作必需的条件。举个实例：我国工资差额比资本主义国家小得多，但为了照顾人民的疾苦，党还是号召国家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降低工资；一切工作条件可以降低的，党还是号召他们自动降低；我国曾经实行过的干部休假制原是合理的，为了照顾人民疾苦，党还是号召年轻无病的干部自动放弃休假。此外，党规定干部要参加体力劳动，军队要帮助居民等等，难道不是和人民同甘共苦吗？

右派分子为了要变天，就对我們现在的社会制度施行种种恶毒的进攻，但是他们的谎言诬蔑，是经不住驳斥的。事实是最有力的驳斥，全国人民紧密的团结在党的领导下，在揭破右派分子的阴谋之后，大步迈向美丽的未来这一事实，正说明了我们的社会制度是现在我們所能有的最好的社会制度。

（原载1957年9月12日“中国青年报”）

論社会主义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

李哲人

民主是屬於上层建筑的东西，它是为基础服务的。有什么性質的基础，就有什么性質的上层建筑，因而也就有什么性質的民主。資本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建立在生产資料私人所有制之上的，因而它們的民主是为这个私人所有制服务的。也就是說，資產階級的民主，只是少数資本家剝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民主，而广大工人階級和劳动人民却处在被剝削、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沒有民主和自由。而在我們社会主义国家里，我們的民主是为巩固社会主义生产資料公有制服务的，这种民主体現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是最大多数人的民主。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与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有着根本的區別，这是不能任意歪曲的。但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幌子下，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主要方面之一，就是歪曲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性質，向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进行猖狂的进攻。

右派分子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民主，实行兩院制，把政协搞成上議院，成立“政治設計院”才民主。右派分子說：社会主义束縛思想言論自由，象英国海德公园式的言論自由才算真民主。他們認為：既要民主，就不能要專政；既要民主，就不能要集中；既要自由，就不能要紀律。他們主張絕对的自由、絕对的民主。

为了粉碎右派分子对人民民主制度的进攻,我們有必要弄清楚以下几个根本問題:社会主义民主不如资产阶级民主嗎?人民的專政会妨碍人民的自由嗎?集中会妨碍民主嗎?社会主义的紀律会妨碍人民的自由嗎?

关于民主与專政、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紀律

現在先談談民主与專政、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紀律这三个关于民主制度的基本問題。

右派分子說英美資本主义国家民主,我們国家不民主,因为我們有專政。这样說,好象資本主义国家沒有專政。这显然是胡說。世界上一切国家都是階級的專政,問題要看什么階級对什么階級專政。在一切資本主义国家中是资产阶级專政,即少数資本家对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人民的專政。他們的一切政策、法令,都是由此出发的。他們对内压迫剝削本国的劳动人民,其中帝国主义国家还对外掠夺和侵略弱小国家,亡他人之国为自己的殖民地。资产阶级專政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少数人民主,多数人沒有民主,少数人自由,多数人失去自由。我們国家則不然。我們国家是工人階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国家。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是以工人階級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对反动階級、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敌人的專政。我們的民主不是属于少数人的,而是属于最大多数人的,是属于工人、农民和其他一切劳动人民以及一切拥护社会主义和爱国的人民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是人类历史上最民主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几亿被侮辱、被損害、被剝削的飢寒交迫的奴隶升到了主人翁地位,使他們的生活和

自由得到保證，使勞動者得到光榮，使婦女得到平等地位，使全國各民族都能平等和諧相處，使各民族中大批优秀工人、农民、婦女、青年參加管理國家工作。這難道不是最廣泛的民主嗎？請看：解放以來我國幾億农民翻身，消滅地主階級，分配地主侵占去的地；幾億人民動員起來鎮壓和肅清反革命分子，使全國人民得以安居樂業；幾億人民熱烈支持抗美援朝，保衛祖國，保衛和平勞動；幾億人民轟轟烈烈地進行三反五反，克服貪污、浪費、官僚主義，消滅五毒，打退資產階級猖狂進攻；幾億人民歡欣鼓舞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幾億人民本着勤儉建國的方針積極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為改善自己生活而努力；幾億人民委托自己選出來的代表制定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和其他一切法律，這一切難道不是最廣泛、最充分、最深刻、最生動的實際的民主嗎？右派分子對於這樣真正民主不感到興趣，不加贊揚，反而感到是“死水一潭”，“心驚肉縮、毛骨悚然”，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的立場是資產階級右派的立場。他們看到本階級被勞動人民消滅掉，看到原來的奴隸翻了身，當了主人，因而懷恨在心，一遇到機會便想進行資本主義復辟，恢復他們當年壓迫和剝削人民的所謂“民主”、“自由”。

右派分子說，你們既要民主，為什麼一定要專政呢？我們說，一定要專政。因為如果不对反动階級和反动派以及一切反对社會主義的敵人實行无情的專政，便無法保障廣大人民的民主。如果讓反动派有了民主自由，人民就會失去民主自由。因此，對人民的敵人實行專政，就是為了保護人民的最廣泛的民主，就是為了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這說明我們的專政是專門對付敵人的；而民主則是人民內部的事，對

人民只有民主，沒有絲毫專政。人民的專政并不妨碍人民的民主，而正是保护人民的民主。右派分子所以感到有專政就不民主，是因为他們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自然就感到專政的压力。但这正是人民要达到的目的。

右派分子認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專政的任务可以沒有了。这种說法也是錯誤的。这是因为我們国内还有一些殘余的反革命分子，他們仍然在伺机而动。在原来的剝削階級分子中，还有对社会主义建設进行破坏活动的人。此外，在社会上还有一些盜竊犯、詐騙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坏分子。尤其不要忘記美帝国主义和蔣介石集团还經常對我們进行武裝挑釁，并且不断派遣特务、間諜来进行破坏活动和顛复活动。因此，我們决不能削弱專政，并且要繼續对坏分子加强專政。資產階級右派这次向我們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的猖狂进攻，其主要矛头就是指向我国的无產階級專政和共产党的領導。我們这次反对資產階級右派的斗争，絕不是一般的斗争，而是在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的偉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无產階級社会主义革命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資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是一場劇烈的你死我活的階級斗争。这场斗争我們必須获得全胜，才能保證我国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彻底胜利和巩固。因为如果讓資產階級右派的反动毒素自由散播起来，它就会向各个方面进行腐蝕，我們的社会主义就会发生危險。右派分子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共产党何必小題大作，缺乏雅量呢？”这是右派分子的烟幕彈。匈牙利事件就是裴多菲俱乐部反革命集团先从思想战綫、政治战綫方面搞起来的；在国内外反动派相互勾結下，后来爆发了匈牙利反革

命政变。我国的情况虽然不同于匈牙利,但是我们决不能失去警惕或对右派分子抱有温情主义。

右派分子还攻击我们说:你们既讲民主,就不应再要集中,有集中就不能民主。他们要求绝对民主。这也是一个极端反动和荒谬的观点。

在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我国国家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在这些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中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国家制度,才能既发扬人民民主,又能统一和集中使用国家权力,并且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马克思主义者是主张集中制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集中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民主集中制,这种集中制是把高度的集中和高度的民主结合在一起的。我们的政治制度有高度的集中,但是这种高度的集中是以高度的民主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的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人民当自己还处在被压迫的地位的时候,不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和力量充分地集中起来,因而曾经被人讥笑为“一盘散沙”。那时内外反动派都来欺侮中国人民。当人民获得解放,并建立了自己国家以后,当然要把自己的意志和力量充分地集中到国家机构里去,使国家成为一个坚强的统治机器。人民的国家机构越是坚强,它就越能够压迫敌人、打击敌人,越有能力保卫人民的利益,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保障幸福的生活。

在我国国家里,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各种社会团体都是

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如果只有民主，沒有集中，就不可能有計劃有組織地統一办理国家大事。一个工厂和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只有民主，沒有集中，就不可能有計劃地进行生产。任何一个工作單位，如果只有民主，沒有集中，就不可能有計劃地有效地进行工作。就是將來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为了管理好人民經濟，也仍然需要必要的集中。当然，我們的集中制是必需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由此看来，我們把民主和集中結合起来，不但絲毫不妨碍人民民主，而且能够更好地保障人民民主的利益。

为什么右派分子強調要民主，不要集中呢？他們的陰謀是想发展資產階級的分散主义、自由主义，以瓦解劳动人民的組織性和战斗性，使我們的国家处在散漫的、无組織、无力量的状态，使人民不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以便利他們进行資本主义复辟的反动活动。

为了反对右派的陰謀，我們必須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

右派分子还攻击我們說：你們既講自由，就不應該再強調紀律。他們不要紀律，而要絕對的自由，这也是一个极端反动和荒謬的論点。自由和民主一样，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有了反动階級、反动派和反动分子的自由，就沒有工人、农民和爱国知識分子的自由。不剝夺反动派的自由，劳动人民就沒有自由。因此，絕對的自由，只是資產階級騙人的一个反动口号。人民并不贊成絕對的自由，人民是既要自由又要紀律。为什么？因为有了紀律，人民才能有秩序地共同进行生产、建設和工作。但是我們所說的紀律不是別的，而是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自己的紀律，这种紀律是建筑在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和自覺的基础上的。剝削階級的紀律是專門压迫劳动人

民的，是建筑在棍棒和飢餓的基础上的。人民坚决反对剝削階級压迫他們的紀律，但是人民愿意服从自己的紀律。資产階級右派分子煽动群众不守紀律，他們的企图就是要发展資产階級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以涣散我們的社会主义力量。

自由与紀律必須結合起来。如果只強調自己自由，不遵守共同紀律，那就要侵犯社会主义集体利益，妨碍大家的自由，大家必然反对，因而也就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这說明自由和紀律的关系就是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必須正确地結合起来。个人利益是要适当照顧的，但更重要的是个人利益必需服从集体利益，而不能破坏集体利益。我們必須坚持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反对右派分子的所謂絕對自由。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 資本主义国家議會制度

現在我們把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資本主义国家議會制度、我国的选举制度和資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制度加以分析比較，看一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資产階級的民主制度究竟哪个好。

外国資产階級吹嘘他們的議會制度是真正的民主制度。我国資产階級右派分子也有同样的說法。請看事实眞象：

資本主义国家所謂全民代議机关——議會(或国会)，在形式上是作为資本主义国家的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而存在的。在一般情況下，政府即由議會中占多数議席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的代表組成，并对議會負責。因此，从形式上看它在資本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實質上，它在过

去和現在都是資產階級用來統治壓迫和剝削廣大人民的一個工具，絕不是什麼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機關。列寧曾經指出：“請看任何一個國會制的國家，由美國至瑞士，由法國至英國、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國家’工作是在后台辦理的，是由閣部、官廳、參謀部執行的。在國會里，僅僅專為愚弄‘老百姓’而從事空談。”^①“每數年一次解決統治階級中什麼人應當在國會中鎮壓并壓迫人民——這就是資產階級國會制底真正本質，不僅在國會制的君主立憲國內是這樣，即在最民主的共和國內也是這樣。”^②

資本主義國家議會的組織形式，一般是採取兩院制，分成上院和下院。例如，英國：上院叫貴族院，下院叫平民院。美國、意大利、日本：上院叫參議院，下院叫眾議院。法國：上院叫共和國參議院，下院叫國民議會。

資本主義國家採用兩院制，主要因為：(1)上院議員的產生，一般都不經過民選，而是由貴族世襲、國王恩賜、在貴族中選任或由國家最高行政首長任命的。即使有一部分經過民選產生的，但是在選舉資格上也比下院有严格的限制。(2)上院一般比下院有較大的權限，而且具有否決權或延緩下院所通過的法案的權力。這就使上院可以利用這種特權在立法上牽制下院，以便防止萬一不利于資產階級統治集團的法案的通過，從而保障資產階級統治集團的利益。因此，上院通常是反動勢力的堡壘。資產階級就利用這種組織形式來加強對議會的 control，使議會在實際上為資產階級服務。

① “國家與革命”，“列寧文選”兩卷集第2卷，1950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00頁。

② 同上書，第199頁。

再看資本主义国家議會中的議員，是些什么人呢？

美国国会中沒有一个工人、农民和共产党以及进步团体的代表。美国第八十三届（一九五二至一九五四年）国会的議員成份是：和壟断資本組織有密切关系的律师二百七十九人，資本家一百三十八人，职业政客三十七人，反动报纸記者十八人，地主十八人，軍人八人，其他职业者三十三人。在这一届国会的五百三十一名議員中，只有十六名是妇女、三名是黑人（黑人人口占美国全国人口百分之十）。

英国一九五一年平民院議席共有六百二十五席，其中保守党和倾向于保守党的占三百二十一席、工党占二百九十四席、其他党派占九席、平民院議長一席。在保守党和工党六百一十五个議員中，公司經理和大商人占一百七十三人，律师九十五人，軍事將領和公务人員五十一人，資产階級專家一百三十二人，工党的职工会右派官僚分子一百四十人，其他二十四人。英国共产党的候选人在当时选举中虽然获得了几万張选票，但由于反动的“多数选举制”的限制，在平民院中却沒有一个席位。

从这些議員的成份，也可以明显地看出資本主义国家的議會是代表少数資本家的意志和利益的，一点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資产階級經常吹嘘他們的“民主”表現在議會开会时互相爭吵鬧罵的緊張空气中，我国資产階級右派分子也很欣賞那一套。实际上那种爭吵鬧罵只是“專为愚弄老百姓而从事空談”（列宁語），完全是一种虛假的民主，絲毫不能影响資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按照資产階級統治集团的意旨办事。

資本主义国家的議會开会，就是議員的职业。他們議會

开会的时间很长，几乎一开就是一年半载，而且决议案元首不批准，便无效。资本主义国家議員借口他們是“代表全民”的，可以不对原选区选民負責，不受任何选民监督，不向选民报告工作，选民也无权撤換任何議員。这样，就便于他們胡作非为，为他們的后台老板资本家服务。

以上事实充分說明，资本主义国家議会的实质完全是资产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專政的工具，对资产阶级說来是民主，对劳动人民說来則是压迫、黑暗和痛苦。

我們再来看一看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怎樣的情况。

我国宪法規定：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是真正的人民代表机关，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的成員和无党派人士参加，具有非常广泛的代表性。在全国一千二百二十六名代表中，除了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代表占有多数（这反映我国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性質）外，工商业者有六十五人，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工作者有三百零三人，各种宗教职业者十二人，人民武装代表七十六人，少数民族一百七十八人，妇女一百四十七人。还特別規定国外华侨有三十名代表。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着最高权力，而我們国家的行政机关，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监督本級人民委员会，并且有权罢免本級人民委员会組成人員。我們国家的大事不是由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来决定的，而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的；在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閉会期間，是經過它的常务委員會討論和決定的。地方性的問題，是經過地方人民代表大會討論決定的。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就是這樣能夠作出決定並能有效地監督決定的實施。我們採用這種制度，是根據我國人民革命根據地和全國解放以來政權建設的長期經驗，並參照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經驗。這種政治制度，是同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性質相適應的，是完全符合我國國情的政治制度。它能夠便利人民群眾經常通過這樣的政治組織參加國事的管理，從而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來為建設社會主義和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努力。

右派分子還攻擊我們，說我國人民代表大會總是一致通過決議，不如資本主義議會開起會來有爭論，有民主。我們說：我們的民主才是真實的民主。我國的重大問題，都是經過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及社會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事先充分協商和民主討論的；其中全國性的特別重大的問題（如憲法），還提交給全國人民討論，然後將意見集中上來，對原方案加以研究修改，在中央人民政府中討論通過後再提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審查通過，然後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決定。經過這樣充分的民主過程提出的方案，在人民代表大會上自然是一致通過。難道問題在會前已經充分協商、討論、研究，並且得到圓滿解決，還需要在人民代表大會上象資本主義國家議會那樣吵吵鬧鬧嗎？我國人民代表大會所以經常能夠一致通過決議，除了上述原因之外，還因為我國六億人民是在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着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大家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人民內部的矛盾可以通過“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來正確處理。此

外,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正是民主精神的发扬和表现。

从以上情况看来,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制度一样,它是最民主的,全体人民都享受着这种广泛的民主权利。资本主义国家议会制度是虚伪的民主,是少数资本家的民主,对广大人民说来是不民主。

我国的选举制度和资本主义 国家的选举制度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说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普遍、直接的选举是所谓真正的民主。也请看事实的真象:

资本主义国家形式上宣布了选举权,实际上有很多限制,使劳动人民无法获得选举权。如美国对选举资格就有五十多种限制。资本主义国家对选举权的限制主要有以下几种:

(1)财产状况的限制:如美国乔治亚州法律规定,凡置有四十英亩土地或缴纳三百美元捐税的人才拥有投票权。英国规定每个被列入国会选举名单中的候选人,必须缴纳一百五十英镑的押金,如果候选人没有获得占选民八分之一的选票,押金就予没收。这种制度实质上限制了广大人民自由推选候选人的权利,也剥夺了一切进步组织广泛提出候选人的可能性。

(2)教育程度的限制:如美国有十六个州规定选民必须会用英语读和写,有的州规定选举前要对选民举行一次笔试。在英国和比利时等国,凡具有高等教育程度的人,可以有于一票的投票权。这就剥夺了许多没有机会受教育的广大劳动人民的选举权。

(3)民族和种族的限制:如在美国黑人中有选举权的只有

百分之十，而实际上能参加投票的不过百分之一。在南非联邦，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黑人和印度人没有选举权。

此外，还有居住期的限制、年龄资格的限制、对妇女选举资格的限制、对军人和水手选举资格的限制等等。总之，一切都是为了剥夺和限制广大劳动人民的选举权利，巩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

(4)在选举方法上也有许多限制，使劳动人民不能实现选举权。例如：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曾经采用了“比例选举制”，即国会所有席位按获得票数的多寡，各政党按比例进行分配，因而在一九四六年法国共产党在国民议会中获得了最多的席位（一百八十三席）。但是在美国的压力和直接干涉下，法国资产阶级便对公民权利和自由发动了进攻，到一九五一年战后第二届国民议会改选时，法国反动派就废除了比例选举制，实行“一轮多数联盟制”（就是任何党派或党派联盟，只要在所划区内获得半数以上选票，就可以独占该选区所有席位），其目的就是要剥夺法国工人阶级在议会中一切代表资格。因而一九五一年法国共产党虽然在国民议会选举中，获得了比其他政党更多的选票，但它在国民议会中所占席位却比其他政党要少。

资本主义国家在选举中还发生形形色色的威胁、公开恐怖和贿赂以及收票和算票时的舞弊欺瞒行为等丑事。例如：为了控制选举，资产阶级总是要花许多钱来收买选民、替候选人作宣传、甚至支付他们所雇用的恐吓选民的刑事分子的费用。一九五二年选举总统时，美国俄勒冈州的十八个代表以四万七千四百零七美元的批发价格出卖了自己的选票。一九三四年美国密苏里州银行集团的老板潘特哈斯特为杜鲁门活

动参議員时，把坎薩斯州西奇市五万死人的姓名列入选民册。这些死人的名字是潘特哈斯特的奴仆从坟地的石碑和紀念碑上抄下来的。这些“死魂灵”給杜魯門保證了多数的选票。

以上事实說明：資产階級国家所說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选举，实际上完全是一种欺騙、愚弄、包办、威胁和收买，一点民主气味也沒有。

我們国家的选举制度是真正的民主选举制度，它和資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制度有着本質上的区别。我們的选举制度是为了真正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并且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把一切可以团結的力量团結起来，而不是象資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制度那样用虛伪的形式欺騙人民，保护少数資本家的利益。我国的选举制度的特点，就是选举权的普遍性和平等性。我国宪法規定：凡年滿十八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年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所有男女选民都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选举，每一个选民都有一个投票权，也有被选举权；同时規定各級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額和代表的产生，都以一定人口的比例为基础。对各少数民族的选举，也做了專門的規定，給予必要的照顧。由于我国当前的各种具体条件，我国在选举中还必需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內剝夺尚未改变成份的封建地主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必須剝夺依法被剝夺政治权利的反革命分子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規定了城市和乡村选举代表名額的不同人口比例，我們还在实行多級选举制，并且在基层选举中多数采用举手表决的方法。我国的現行选举制度是实事求是地适合我国目前时期的情况的，是最便利和适合人民行使选举权利的一种选举制。我国的选举制度还

規定了选举費用都由国庫开支,对于选举的違法舞弊行为予以严厉惩处,从实际上保证了选举人和候选人能够充分享受到自由选举的权利。这同资本主义国家对选举資格規定各种限制和采用賄賂、收买、威胁、欺騙等舞弊活动来侵夺选民的选举权利是完全不同的。一九五四年五月底,我国胜利地完成了全国第一次基层选举工作,登記选民总数占进行选举地区十八周岁以上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七点一八,实际参加投票人数占登記的选民总数百分之八十五点八八,这充分說明我国选举制度是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热烈拥护的。

資产階級右派分子攻击我們說,你們的候选人都是事先商量好才提出的,而且是提多少就选多少,这样就不民主。我們認為,由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协商提出联合候选名單,可以切合实际和照顧各方面的名額,这种作法可以把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选上,可以保证代表的广泛性。实际上有許多名額是共产党人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出发而讓給非党人士的。还应当指出,根据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規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不屬于各党派、团体的选民或代表,均得按照选举区域或选举單位联合或单独提出代表候选人的名單;同时,虽然各党派和人民团体联合或单独提出了候选人名單,但是,投票人如果要在候选人名單以外另选自己愿选的其他任何选民,他是完全有权利这样作的,并沒有任何限制。

右派分子还攻击我們在县以上机关沒有实行直接选举。其实这并不是因为我們主观上不喜欢直接选举,而是因为从目前条件下,我国現行的选举制度是最能够体现人民意志的,最能够發揮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因而最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

建設事業的。我們承認，我們現行的選舉制度，比起蘇聯現行的選舉制度，還是不夠完備的。蘇聯已經實行了世界上最民主的選舉制度。隨着我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我國的選舉制度將來也一定逐步地達到最完備的地步。

從以上情況來看，我國的選舉制度和資本主義國家的選舉制度對於人民來說哪一種制度是真正的民主，難道還不明顯嗎？

上述各種情況明顯地說明，社會主義民主和資本主義民主性質是完全不同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是狹隘的、虛偽的、腐朽的、反動的。美國現在干脆走向法西斯化，越來越暴露出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反動本質，越來越被廣大人民所厭惡、所憎恨、所反對。

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一樣，是世界上最廣泛、最真實、最先進的民主制度。在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下，廣大的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有計劃有步驟地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建立了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人民在政治上已經獲得了充分的民主自由，並且在國家經濟迅速發展的基礎上使自己的物質和文化生活得到普遍的迅速的改善。這就充分表現了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優越性。因此，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為廣大人民所擁護和熱愛，並且為資本主義國家的被壓迫的勞動人民所嚮往。右派分子對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大肆進攻，必將為我國廣大人民所徹底粉碎。

（原載“學習”1957年17期）

从右派反苏罪行說到資產階級民族主义

錢俊瑞

現在大家的眼睛已經看得非常清楚了，資產階級右派的陰謀是要使資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在当前国际国内条件下，就是要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統治复辟。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对于右派最关紧要的事，就是对內要反对共产党，对外要反对苏联。共产党不打倒，和苏联的友好关系不割断，社会主义势必稳坐江山，反动統治复辟的夢就根本做不起来。反共和反苏，这一双象連环套似的扣得紧紧的任务，四十年来一直担在世界上各个角落里的一切地主資產階級反动派的肩膀上，不但絲毫不見松动，竟是越来越沉重了。真是好苦！但是又有什么别的法子呢？垂死的掙扎迫得他們非把这付担子挑下去不可，直到把他們全部压碎，一个不留为止。今天在新中国土地上活着的資產階級右派，正是这样“勇敢”地（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先生这样称赞他們）挑起反苏反共的担子来的。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反苏陰謀活动从去年下半年起重新表面化起来，这是有国内和国际的原因的。一九五六年我国生产資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这就根本剝夺了資產階級所賴以进行資本主义剝削的基础。資產階級中的右派对此就非常之惱火了，他們要起来頑抗，要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民主專政，反对社会主义；同时他們也必然要反对苏联，因为苏联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

我們的同盟國家，是我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最忠實和最有力的支持者。在國外，一九五六年下半年美帝國主義挑起了一陣世界性的反蘇、反共、反人民的风潮，還鬧了一個匈牙利事件。我們國內的右派從這裡得到了“啟示”和鼓勵，就產生了他們的對於世界局勢的完全錯誤的估計。他們得意地認定：“世界大局要大變了”，“國際局勢不是趨向緩和，而是趨向更加緊張”，“社會主義陣營吃不住了”，等等。於是他們就來了一股據說是不知從什麼地方來的“勁”（應當告訴右派分子，我們廣大人民是清清楚楚地知道你們這股勁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參加了這個世界性的反蘇反共的合唱隊了。

於是，右派分子章伯鈞竟狂妄到這樣的地步，他以应邀訪蘇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團的成員的身份，公然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的宴會上，借批評斯大林為名，放肆地發表反蘇講話了。

於是，右派分子龍雲就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上，大肆挑撥中蘇關係，在蘇聯對我貸款和所謂蘇軍“搬走機器”等問題上，故意歪曲事實，顛倒是非，對蘇聯進行了無微不至的惡毒的攻訐。他甚至把帝俄侵略中國的老賬也算到蘇聯頭上，來煽動反蘇情緒。

於是，各色各樣的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露出頭來，跟着作反蘇的狂吠了。

反蘇“英雄”龍雲（我們必須記住，他曾經在大漢奸汪精衛投敵叛國時就和汪有勾搭關係）最近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所作的“檢討”中，還認為自己“當初在發言動機上自以為是狹隘的愛國主義，實際的客觀效果卻是反蘇、反社會主義、反黨、反人民的。”果真是這樣么？其實，龍雲只說對了一

半，另外却掩盖了更其重要的一半。应该肯定，龙云的言行无论在动机上和客观效果上都是反苏、反社会主义、反党、反人民的。在龙云的思想里，除了反苏这一面外，还有亲美崇美的一面。龙云不是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同时又大肆宣传美国的可敬可爱和美国比苏联要“大方”和“善良”得多么？龙云就是这样一面反苏，一面崇美，他想以反苏达到投靠美帝国主义的目的，也就是说，达到恢复旧中国半殖民地被奴役之目的。这里难道有半点“爱国主义”的味道么？在现在世界上，反对苏联，必然只能符合帝国主义的利益，必然就要背叛自己民族的利益，这难道还不清楚么？

反苏亲美是近来资产阶级右派对外纲领的核心。龙云如此，章罗联盟也是如此。章伯钧不是一面对苏联极尽中伤污蔑之能事，一面大大宣扬美国的“政治民主”么？罗隆基不是在口口声声地宣传他的“美国生活方式”，并且朝思暮想，让美国来廉价收买罗隆基这匹骏马么？这里就暴露出资产阶级右派这种反苏的民族主义的极端反动的本质。

右派分子反对联合苏联，把自己装扮成为“爱国者”的模样，好象他们处处在为“民族利益”着想，实质上他们是想用反动的民族主义思想来煽动群众，来挑拨中苏之间的不和。我们知道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作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的一种表现，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不可调和的，互相敌对的。资产阶级从追求利润的天性出发，他们关于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是怎样的呢？那就是：在国内，他们僭称自己是本民族的代表，或者本民族利益的保护人，而实际上则使整个人民的利益服从于资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中的某一阶层（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把它这一阶级或其中某一阶层的利益放在全国人民

利益之上，放在國內各民族的利益之上；在國外，他們把自己民族（實質上是指資產階級）和其他民族的利益對立起來，把自己民族看得高人一等，在可能的時候，就去壓迫和剝削其他民族，實行侵略。這種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發展的最高形式，就是各帝國主義國家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統治，就是帝國主義侵略戰爭，就是現在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奴役世界的罪惡計劃。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在另外的條件下却又可能轉變為民族投降主義。當本國民族受到外國帝國主義的嚴重侵略進攻的時候，或者在資產階級、特別是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和本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發生尖銳矛盾的時候，或者本國人民起來威脅他們的統治的時候，資產階級特別是大資產階級，就可以向異民族的統治者或其他帝國主義者，屈膝投降，出賣自己的民族，幫助異民族的統治者或者其他帝國主義者來壓迫本國的人民，來達到保护自己的財產，維持自己的政治地位或統治的目的。法國的貝當，挪威的吉斯林，朝鮮的李承晚，越南的吳庭艷，中國的蔣介石和汪精衛，就是這種投降主義的典型。

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可以表現出各種不同的內容。首先，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可以有進步性，正義性。如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資產階級曾經進行了反對異族壓迫的民族運動，建立民族國家。在近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資產階級，因為他們同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勢力都有矛盾，在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上能夠用民族主義的口號，動員群眾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上述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就具有歷史的進步性和正義性。這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革命的民族主義。

我們贊助这种革命的民族主义,而且应当在同盟者“不阻碍我們以革命的精神去教育和組織农民和广大被剝削群众”(列宁)的条件下,和这种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作用的資产階級民族主义合作,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統治。中国共产党人同孙中山的合作,以及后来同民族資产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合作,就是这种合作的显著例子。历史告訴我們,在一个被压迫的民族中,当无产階級已經在階級斗争的舞台上出現,并且已經成为全民族反帝反封建的領導者的时候,第一,无产階級应当尽可能地和反帝反封建的資产階級民族主义者合作,建立尽可能广泛的民族統一战綫,以利于团結全民族,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否則就会犯严重的錯誤。第二,資产階級或者其他任何階級、政党和个人,只要他是真正的爱国者如同偉大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者孙中山一样,就必然要和无产階級、共产党合作;在对外关系中,必然要和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联合和合作。而如果他反共反苏了,象蔣介石、汪精卫那样,那么他就必然成为遺臭万年的民族叛徒。

其次,資产階級民族主义在当前的国际和一定的国内条件下,在对外关系領域内,还会表現为中立主义的民族主义。在資本主义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現了一批和平中立的民族主义国家。这是当前国际关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力量。在这些国家里,作为当前的指导思想和領導力量的,是和平中立的資产階級民族主义和民族資产階級,它的作用也是反对帝国主义和侵略战争的,我們對他們應該采取同情和联合的态度。我們要和他們在和平共处的五項原則下发展和加强团結合作,共同反对殖民主义和爭取世界的持久和平。

但是，这种中立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如果产生在社会主义国家，那就会发生消极的作用，而成为修正主义的重要部分。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例如在我们中国，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和上层知识分子，不赞成或者反对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实行一面倒的政策，而想代之以中立主义的中間路綫，就是說，既联合苏联，又联合美帝国主义，而竟亦美其名曰“和平共处”。我們說，这种不区别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不分敌我的修正主义的中間路綫，和我們所主張的和平共处，和我們的和平外交政策，毫无相同之点。毛主席在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明明白白告訴我們：“巩固同苏联的团結，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結，这是我們的基本方針，基本利益所在。再就是亞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們应当巩固和发展同它們的团結。有了这两种力量的团結，我們就不孤立了。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們也要团結那里的人民，并且爭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們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而那种中立主义和中間路綫恰恰坚持和散布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因此它只会削弱和破坏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結，只会放松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阴谋的警惕，它对社会主义国家国内的建設，对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都是有害无益的。因此我們对于社会主义阵营里边所出現的这种中立主义的民族主义，决不表示同情，而应该采取批判和反对的态度。

最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资产阶级得势的时候，便表现为民族压迫和民族侵略，它常常以“胜利民族”或“优等民族”的姿态出現，压迫和侵略别的民族。这是我們所要坚决反对

的反动的民族主义。这种反动的民族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发展到了顶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作为帝国主义阵营的首领，把这种民族侵略主义发展到最露骨、最野蛮、最无耻、最毒辣的程度，它业已成为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公敌。它的侵略主义，它的新式殖民主义，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手段和内容，那就是反对苏联，反对人民中国，反对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它竭力宣传所谓苏联“赤化的危险”，所谓共产主义中国的“侵略”和“好战”，来恫吓其它国家的人民，也恫吓美国人民，以便他们能够进行廉价的讹诈。它向中近东国家宣布的艾森豪威尔主义就是这种最毒辣的民族侵略主义的标本。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这种压迫和侵略其他民族的性质，在今天新中国里生活着的右派分子身上也有一定程度的表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随着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在各方面的艰巨努力，我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显得重要。当然，这是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所共同庆幸的事情。但是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他们过去和现在的阶级地位，或者由于他们过去所受教育的影响，却滋长起一种反动的民族主义倾向。他们开始建立起自己对其他民族的优越感，他们的尾巴翘得那么高，以致忘掉了我国宪法所规定的“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而开始要实行他们反动的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也忘掉了宪法所规定的“我国根据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同任何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政策”，而开始要实行他们的反动的大国沙文主义。

特別應該指出，这种資產階級民族主义思想表現在对苏联的关系上，就成为极端反动的反苏的民族主义。这种思想實質上反映着旧中国时代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階級地位，他們坚决地反对社会主义的苏联，同时又頑强地要求我們的国家重新投向美帝国主义的怀抱，变成它的殖民地和保护国。資產階級的极右派之所以在最近特別瘋狂地进行反共反苏的阴谋活动，就是因为他們看到不仅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础早在解放初期已經完全被剝夺了，就連資產階級的全部經濟基础——生产資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也已經經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被摧毀了。資產階級右派这种完全非正义的、兽性的階級仇恨，在对外关系上，就表现为如此露骨和猖狂的反苏的民族主义。

應該看到，我国資產階級右派这种反苏的民族主义反动思想和反动活动，从世界全局来看，則是美帝国主义所倡导和組織的世界性的反苏反共运动的一部分。但是很可惜，要唆使中国人民起来反对自己最友好最可靠的朋友、兄弟和同盟者苏联，看来是絕對办不到的了，是注定要失敗的了。关于这一点，即使那位当前世界性的反苏反共运动的主要組織者之一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先生似乎也知曉几分了。要不然，他为什么六月廿八日还在旧金山講出那样泄气的話来呢？他竟然說：“俄国和中国共产党人是由紧密的思想联系連結在一起的。”

一点不差！这种紧密的思想联系是什么呢？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无產階級的国际主义。这种“連結在一起”又叫做什么呢？就是偉大的中苏友好同盟！

非常狡猾而又非常愚蠢的右派头目們听着！你們的一切

无耻透頂的反苏謠言和狂吠，是騙不了我国广大劳动人民的。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經過近百年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曲曲折折的奋斗，眼睛早已雪亮，对于誰是敌人，誰是朋友这样一个基本性的問題已經看得清清楚楚。你們灵魂深处的真实上司杜勒斯先生已經点化过你們了：中苏兩國人民确实是由共同的思想紧紧連結在一起的。誰要在这个以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民族平等原則为基础的坚如磐石的中苏偉大同盟前面耍什么反苏的民族主义之类的臭花枪，他就会碰得头破血流，自取灭亡！当然，信不信还是由你們。

(原載“学习” 1957年16期)

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



保卫党， 保卫社会主义

——驳斥右派分子的几个谬论

5002

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
——駁斥右派分子的几个謬論
本社編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总經售

787×1092 1.32 4 1/4 印張 85,000 字
195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71,000 定价(5)0.28元